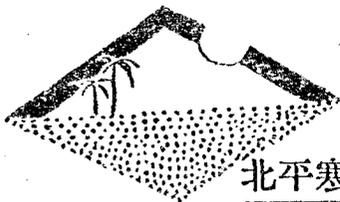


#165

276010

# 重農學派

魯平著 陶達譯



北平寒微社出版

1932

## 目 錄

譯者序	1—2
序言	1—2
第一章 十八世紀中葉 <u>法國</u> 國民經濟的情形	3—20
第二章 <u>開納</u> 行傳及重農學派史略	21—46
第三章 重農主義者底經濟政策	47—67
1. 土地改革	47—57
2. 自由貿易	57—64
3. 稅賦政綱	64—67
第四章 純生品的學說	68—87
第五章 <u>開納</u> 底“經濟學圖表”	88—98
第六章 重農主義者底社會階級的立場	99—108

## 譯者序

本書的作者——魯平先生乃蘇聯，不，乃現代世界最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家之一。光就他底價值論講吧，已引起蘇聯政治經濟學界一度熱烈的爭論，尤其自1929年至現在的階段中論戰最為激烈。是書在德國在世界皆甚有名。然而作者底特長，尤在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如“經濟思想史”，“現代西歐經濟學家”皆名著也，本書——“法郎士開納”雖也為歷史的作品之一，却非一部了不得的名著，也非作者底代表作。而譯者所以要把牠譯成中文，却也有他底理由：

1•目下的中國，和十八世紀中葉的法國實際狀況頗相類似；而農民破產的原因與窘況也復相同。十八世紀中葉法國的社會經濟的背景產生了重農學派；雖說重農學派底政綱不會治愈了那時法國的病態；然而它終還不失為一個有根有據的藥方，現代中國呢？怎麼辦？固非譯者底學力和權力所能及，但譯者深信有參考療治那時法國的病態的藥方

之必要。法郎士開納爲重農學派底手創者，他於診治法王及其愛寵——因他原是個醫士——之餘，集其全力去救治法國的貧困病。重農學派底一切學說和政綱都出自他手；故有介紹他底生平和學說的必要；本書之譯即爲此。

2•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觀點，去批評重農主義學說之錯誤，尤以本書爲最中肯。

3•本書分量不多，譯成中文，僅及五萬字而介紹開納底生平以及重農學派底學說與政綱，則簡明無遺，且又通俗易讀。

別的理由，和本書的價值，用不着譯者來囉嗦，只要化三五小時，把本書讀完，一切便都知道了。

陶達，1932年六月寫於北平。

## 序 言

法郎士開納是在經濟思想史上有偉大作用的，重農學說底創設者。不愧為馬克思所稱謂“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始祖，”真的，開納實為嘗試創立解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之理論的第一人。在開納以前的經濟學家，即所謂“重商主義者”，大都限於探討各個日常的實際問題，

關於二個政治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上，開納底功績特別偉大：1，“剩餘價值”問題，2，“社會再生產”問題，開納實為簡明地提出剩餘價值來源問題的第一人，雖因其學說偏於農業生產率之故致使他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問題，然而他已給後來的經濟學家——古典學派的代表（斯密士和李嘉圖）和馬克思——以開墾的起點。



於其社會再生產論中表顯了更偉大的天才名的“經濟學圖表”中他闡明了這理論。表”中開納企圖給包羅生產產品的生產，流和消費底社會再生產的總過程以一簡明的

圖畫，開納真乃時代之先驅者。他底“圖表”遺傳頗久，昂格思且謂這圖表乃科學所不能瞭解而利用之的“不可思議的謎語。”僅於百年後，馬克思在其第二卷資本論中繼續着為開納所創始之社會再生產論的工作。

驟然看來，重農學者底理論，可說為現代讀者所認為很抽象且難瞭解的。但實際上，許多重農學者底觀念——驟然看其幻想頗可驚異——不是別的，乃受十八世紀法國反動社會經濟之條件的影響，且這些社會階級底利益的代表即為重農學者。故本書的內容分配如下。第一章敘述法國的國民經濟，尤其注意到十八世紀中葉，法國的農村經濟。第二章介紹開納底生平及由他所創造的重農學派的略史。讀者在第三章中可以明白重農學者底經濟政策，即說明其實施的法則，他們想藉此重興農村經濟，且以資本主義的基礎去改良。復次，第四章全係說明重農學派底理論的系統，關於這點，第五章和第四章互相關連着，末尾，最後一章，根據上面幾章所介紹的基礎以一般的特性來分析重農學者社會階級的立場。

魯平

## 第一章 十八世紀中葉法國 國民經濟的情形

十八世紀法國的農村經濟已到了大大衰敗的時期了。一方面，牠困於封建制度的殘餘，別方面又苦於偏重工業的重商主義政策，而且國家的稅賦政策也給農村經濟以嚴重打擊。

在鄉村中的封建經濟於十八世紀初即已分化了，但當時順應資本主義生產之農村經濟的新形式尚未施行。農民經濟，仍受累於許多封建殘跡和制令。固然農民已由農奴中解放出來了。聖封地主（封建主）已不能出賣其農民，而且就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農民解放的意義上，其情況也遠較優於尚未取消農奴制以前的俄國農民。然而農民的土地仍須用許多封建式的進貢和納稅贖得之，僅在幾省中的一小部份的農民，他們所握有的土地才有完全私有權。這些農民乃小有財產者。大部份的農民，其土地屬於他自己同時又屬於封建主的，一方面，某農民把其所握有的土地遺留下來，則其後裔即為該土地的主

人，他能轉賣那承繼下來的土地，或出租，出頂之。然而農民底這種私有權是不完全的——他須受聖主的法權之限制。在某幾個教區中，以聖主爲一切土地的管轄者。那教區內一切的農民每年均須給聖主以貨幣量，這數量之大小由明令確定之且不能隨聖主的私意提高。這種每年的納金稱之爲“清希”，農民底耕地叫做“清希地”，而農民本人則叫做“清希者”。

聖主除清希之獲取權外，尚有許多其他封建殘餘的特權。如果農民把土地出賣了，則那土地的新主義應給聖主一定量的貨幣。農民死後，把其土地傳給後裔，也須給聖主一定貨幣量。河流是屬於聖主的，農民使用河水應給聖主一定的租金。同樣過往聖主的公衢，也須給納租金。農民是不準往林中打獵的，如違禁即受處罰。聖主則不但可以率其成羣的獵狗馳聘於林間，且更禁止農民捕滅害蟲。

祇有一小部份農民有足夠的田地和足以擴大其經濟的收入。這些富有的農民，有時候是租種聖主底或附近寺宇底土地。英國就不同了，英國的富有庄家(承租者)於十八世紀已大大地發展了，在法國

則握有自由租得的土地且藉僱工以耕作的承租家甚爲寥寥，是以在法國的農村中正盛行着所謂分種之半封建式的租種制。

分種農民爲沒有田地的或田地甚小的農民，他們沒有田地，沒有爲發達經濟所必需的收入範圍。通常不僅由地主那裏租種一小塊田地，且由地主處租得種子，牲口和農村經濟之簡單的工具。爲此他們應把其收成之一半給納地主，（故名之曰分種承租者），同時在英國的農村中已廣佈着土地私有制和土地租種制之資產階級的形式，而在法國的農村中，則依然充滿着清希地的私有主和分種的承租制。

在這種條件之下，可以明白，法國農村經濟技術的水平是很低下的，這時候，英國已於根本轉變時候過後，農業經濟技術已很抬高。英國的農庄和大農業家已過渡到每年換種法，注意於畜舍內飼養牲畜，增加牲畜的數量而改良牲畜的質量。所有這些新方法在法國都尚未施行。大部份農民都爲每年三種法的經濟，只有小部份地方沿襲古傳的二種法規但其中多半的土地是不會耕種過的。古傳的法規

仍佔勢力，農民都屈服於播轉法，新的耕作法是被制止的。牲畜真陷於可憐的狀態，而肥饒的田地則甚少。消瘦的牲畜，古舊的犁耙即爲法國農民的財產象徵了。山清希者農民不能抬高其經濟，而過於原始的技術又和小有土地的農民與大承租者的經濟有別。在這些條件之下，無怪乎法國將因農村經濟之原始的技術，農業勞働之低下的生產率以及收成歉薄而逐漸衰落了。自十八世紀初至法國大革命的短短時期內，有了三十年荒年；換句話說，即每三年中有一荒年。

且也，農村經濟不祇受累於歉收和封建的貢稅——這些乃落後的封建經濟底殘餘；其最受累者尤以國家經濟生活的新條件爲最甚。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乃是皇權最盛的時期，皇帝由貴族封建主的手裏奪回政權，這些貴族聖主先前在領域內是個無上的有權威者，建造處理農民的法庭和裁判所，且其自己又不願受皇權的節制。到十八世紀，情形就不同了。皇權鞏固起來了，且創設了許許多多官級和強有力的軍隊。聖主都由獨立統治者——在其領域內——變成須仰給皇恩的廷中長官了。皇帝因其喪失政

權，圖報以許多特權，首先就須鞏固其取償於農民貢納稅賦的土地權。貴族們遂完全解放了其直接付納所謂“太而”的稅賦。因而皇權對於貨幣的需求益以增加了。封建時代，皇帝是不養常備軍的，偶遇戰事則號召其貴族的軍旅，這種軍旅即代替其武裝和平者。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則號召其臣僚的軍旅，須久延時日了，故皇帝自己創設了經常的僱傭軍隊，這些軍隊是須給以餉銀的。同樣須把官俸給許多官僚，這些官僚所做的行政和司法的事務，以前都是由封建地主去執行的。因爭奪國外市場而起的許多次戰爭，也耗費了大宗的款項。為搜括這些款項，須增加稅賦，一切的重担遂都落在下層的農業居民，即廣大的農民羣衆的肩上了。農民所給納的最主要者為直接稅賦“太而”的支付，他們更受累於許許多多加在必需消費品上的間接稅。可以很充分地說出，甚至於食鹽都抽特殊的說，這種鹽稅入已引起法國農民的憎恨了

雖強行增稅，但搜括所得，仍不敷國庫的耗費。國庫益行空虛了，乃進行許多次的國家借款。為要支付這些借款的利息，又須更加增加稅賦。這時

候橫征暴斂也不濟事了；政府往往以租賦抵押給富有的財政貸借者而借得款項。政府預先由財政借借者借得一定數的貨幣量，而稅賦的收得則已落入這些財政家的錢袋裏去了，他們固很希望有這樣的美事呢。由居民處搜括所得的稅賦，不下於半數是併吞到財政家的錢袋裏去的。

國家的借貸和稅賦的抵押使皇權仰賴於富有的財政家和高利貸者了。資產階級貨幣的作用大大地增高了，有時，他甚至於能左右政府政策的方向。政府已不復能指揮其僅為地主貴族階級所要求的政策了。她需要憑藉暴漲和强有力的資產階級之最富有的集團了。皇權所以更和資產階級暫時結合者，第一，要由他們那兒取得貨幣，第二，要鞏固集中的國家政權，且欲破除封建地主之最後的衝突。

這種皇權和商業，貨幣資產階級的結合走上了很明顯的重商主義政策的道路，這種重商主義政策，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差不多全歐各國都廣大施行過。重商主義政策實為着重振興商業，尤其是對外貿易的政策。重商主義時代，皇權是企圖着掠奪富庶的殖民地，發達出口的商業，培植製造可以

在外國高價出賣的物品的工場。英國政府注意力的集中首先就在于對外貿易之發達。法國政府則首先注意到培植大的工業企業，即所謂“工場”。在那時候，工場要算是大的企業了，在工場中作工的有很多的工人。在工場中最普遍使用的還是手工勞働而非機器。所謂工場的企業不祇製作紡織品且也製造其他工業品。如在當時所說的眼鏡工場以及玻璃工場等等。

法國重商主義的政策是和著名的宰相葛爾貝——自1661年拜相起至1682年止——有特別密切的關係。葛爾貝極堅決以國家的威權而厲行培植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的政策。故法國人往往叫重商主義政策謂“葛爾貝主義”。葛爾貝爲要發展國內商業，甚至於取消了各省間所已確定了的釐金，——這些乃是封建制的殘餘。中世紀時，各個封地都視爲獨立的國家，於交界處修築道路和橋樑，俾商人過往時便於抽稅。商人由某封地轉運商品到別的封地去，往往要納十多次釐金。這些封建界限大大地阻礙了國內商業。葛爾貝堅決地把全法國併成一個釐金區，在這區域內，商品來往是無須納稅的。可惜，

終因各省和頑固的封建勢力的反抗，葛爾貝受着攻擊，致使這個計畫僅一部分地方實行。

葛爾貝更留心到對外貿易。他創設了大的商艦用以掠奪在美洲的殖民地，且和英國爭取印度。

葛爾貝又採用了所謂“貿易差額”制——即努力增加法國工業品的出口，且盡量縮小由外國輸入的工業品——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商主義政策。爲此葛爾貝用種種方法去培植法國的新工業部門和新工場，尤其製造出口品的工業部門和工場。他留心着紡織的，紡紗的，絲織的，綢緞的，氈毯的，製長機的，玻璃的，以及其他工場的組織。他給工場創設者聘請外國的有名技師，與以經常的資助和無利息的借款，免除稅賦且給與製作獨佔權。

葛爾貝既然准許了工業家免稅了，但又把他們在國家極嚴厲的監督之下。重商主義政策以極嚴厲的法令去引導工業生活，爲要得有利的貿易差額，頒佈了嚴密的法規去禁止外國商品之輸入而獎勵國內商品之輸出。爲要保證法國的商品勝於外國的競爭者，政府即關心到提高這些商品的質量。許許多多的法令和訓諭都詳詳細細地說明物品之長闊，基礎

的數目，染洗的方法等等極細微瑣碎的事情。比如僅就1671年一次的訓諭來說吧，其中就包容着三百十七條關於“各種花樣之絲織物的顏色以及其所需要的成份和本質”。專門工場監督處派出作坊市場的監督者去干涉一切生產的瑣事，偵視等等。如工業或商人有違法規即科以罰金或沒收其財產。這種對於工業嚴厲法令實為極瑣碎極不便的。

在英國這種煩瑣性的重商主義政策很能協助着對外貿易和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在法國，則這種自覺很奮勉的政策，引起相反的影響。固然，在第一個時期內，可以說葛爾貝已達到燦爛的成功：在歐洲許多商工業國家中，法國佔了第一個位置。法國的工場可以算作模範場了，而法國工場為外國皇帝貴族所造出來的奢侈品。在歐洲是無與倫比的，然而這些外表的成功是不穩固的，葛爾貝死後不久，於十八世紀中葉，這成功即開始崩潰。英國重商主義政策所以能為改造經濟之有力的主幹者因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已彰明顯著了。而在為封建制度殘餘所統治着的法國，則範圍廣大的資本主義工業是不能發展的。葛爾貝希望有利於國庫的新工場依然

需要免稅和資助金，反而要吞食了許多國庫的貨幣。而爲法國的工業掠奪富庶殖民地及擴大國外市場的美夢仍未實現。到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在美洲和印度的地位已極鞏固了；而法國在世界市場上僅擠到第二個位置，瑣碎的工業法令阻止了技術的改良且使生產死板化。正如某工場監督者所說，法令束縛着工場主的進取心，消滅其間的競爭而阻止其發明。‘隨便頒佈的法令——他於1761年寫道——無論如何，都不能免除障害。法令任何時候都很危殆，且其中矛盾實多。’十八世紀中葉，往往可以聽到企業者的嘆息，以爲工業法令的政策所資助他們的，不過是消滅了他們這大的發展前程。

重商主義政策已無力使法國變成工業國了，且大有影響於農村經濟的情況。一方面，她把一切稅賦的重担都放到農民肩上去。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培植工場的政策，尋找新的國外市場和屢次的戰爭都要使國庫費了老大的支出。這些支出，首先就須農民去償付。當時的人說，政府頒佈法規由農業各處搜索貨幣，然不給以任何報酬。另一方面，重商主義制度的結果乃是減低麵包價格的政策。爲使工業能取得

廉價的原料和便宜的手工，即應保持農產品價格之低度的水平。此外，還須保證城市的麪包，尤其是巴黎，在巴黎的麪包如不充分，很容易引起騷擾紛亂，甚至使政府受到恫嚇。爲使國內有充分的廉價的麪包量，政府乃禁止麪包之自由出口，在國內又確定了許多箝制麪包商人之極嚴厲的法令。載運麪包到城市裏去的農民，是沒有權利把麪包由城市裏載回去的；無論如何，他都應把麪包在城內市場上出賣。麪包商人的行動須受各種極瑣碎法令之限制，政府希望藉此去防範提高價格的奸商。省政府也往往禁止麪包之輸到別省去。一般地說來，凡麪包之由某省輸到別省者，只有獲得政府的許可方才可以。由於這種對麪包貿易的法令的結果，麪包價格年年極尖銳地動搖着，某省麪包不敷，而別省則麪包跌價。一般地說，因禁止麪包出口之故，法國的麪包價格是比其鄰近的工業國要低些。農業經濟實甚受累於麪包價格之低度的水平，以及麪包價格之經常的搖動不定。所以使十八世紀中葉法國的農業經濟衰敗者，最主要的原因，有這樣三個：1，由於低度的農業生產率，這可以拿原始的農業技術去證明；2，由於爲

禁止麪包出口的法令所引起的麪包價格的低落；3、由於過重的稅賦，這稅賦和聖主的貢稅以及僧侶的什一稅都壓在農民支出預算的重負上。

不消說，在十八世紀法國的著作中，是填滿着貧窮的嘆息聲，絕對大部份的農民都在貧窮中討生活，除去下部份例外的庄家和小康的農民。有個作家於1724年寫道：“鄉村中的人們在極貧困中過生活，沒有床舖，沒有家常用具，大多數的農民甚至大半年光吃黑麥和燕麥做成的麪包，這個已成為他們唯一的滋養料，但還須由他們自己的口中和其家小的口中抽出來去支付稅賦。”根據這個作者的言詞，白拉東的農民，在革命以前，僅光得到其全部收成的四分之一，第一部份納給聖主，第二部份給與僧侶，第三部份又需支付稅賦，僅第四部份才能為其自己和家小的生活料，假定這個統計是未確的，那末，在任何條件之下，半數以上的全部收成是納了稅賦和支付封建主；只有五分之一才為其自家受用的（因收成的低落且往往形成五部份）。所以農民很難剩留為其生活資料所必需的麪包。

可知，在上述的條件之下，農業經濟不但不能發

展且驅使到農業家直接破產的過程而使農業經濟衰落。有許多地方農村居民是大批的餓殍，在別的地方，農業家都去經營零碎的手工業或成爲擁擠的貧窮和流浪的衆庶。有一商人說——1760年——在許多地方大半饒肥可種的土地都荒蕪着，每一步都可以碰到爲農家所棄的田地。有個哀悼大革命不久以前的法國的著名旅行者安耳徒又五遺給我們一幅很明確的圖畫，在那圖畫裏描畫着法國多數省份農業經濟之深深衰敗的景色。據他說，在某省中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沒有耕種，其餘的三分之二，又都帶着破產的悽慘景況；在另一省裏，除了“貧窮和不好的收成”之外，他簡直沒有看到甚着；在第三省中“半貧窮的分種承租者依然保留着極原始的耕種法，毫無改良可言，且給這原始的耕種法遺傳給千代百世的貧困者。”

所以在法國大多數地方，農業不但不能進步，並且連那仍復舊觀的農業經濟之極簡單的再生產的條件也喪失了。並且農業經濟的破產又消失小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可能。真的，政府以各種辦法助着且熱望着的資本主義工業是不能在破產農業經濟之

狹隘的基礎上發展的。農業已經不能充分地供給爲工業所必需的高價原料了：畜類的衰微引起羊毛和皮革的缺乏；很少施用技術的耕作，是不能收穫亞麻和大麻的；各種原料都須高價到外國去買進來。最足以阻止工業發達者實爲國內市場銷路的不充。因爲法國的殖民地政策不能不俯首於首屈一指的英國，故法國工業不僅在國外市場上可以擴充，且在國內市場上也可以擴大。這國內市場是很能擴大的，因有數千百萬居民的法國實超過歐洲的其他隣國。「十八世紀初，法國差不多有一千八百萬居民，同時在英國不過五六百萬耳。」然而千百萬農民群衆之購買力則幾等於零。在農民以其大部份的收成給納地主與國家之後，已無留存下足以購買工業品的貲財了。據又五的回憶錄所說，法國的農民沒有長襪，沒有鞋子，有時候甚至連草鞋都沒有。白拉東的農民，自頂至跟，所穿的不過是粗布，這種粗布往往由極粗暴的蘆子做成的。農民對於工業品的要求所以銳減者，由於行會主和工業家，仗其獨佔的法權，強制地提高其工業品的價格之故。因此，在高度價格的工業品，和低度價格的農業品之間成了

極端的分離——這分離現代人叫他謂“剪刀形”。

十八世紀法國農業經濟的衰敗，很可以證明在那時候統治法國的社會政治的程序已和國內生產力發展的必需性相衝突。在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苟非農業經濟興起是不可能的。然而欲提高農業經濟，又必需消滅聖主的貢稅和國家稅賦之紛歧錯綜的制度才行。很明白地，在十八世紀中葉已需要土地私有權之資產階級的形式去代替土地私有性之封建式了。然而這改良土地性有二條相反的道路可走，即把土地私有權轉給地主抑或農民。在英國廣大的農民羣衆是沒有土地的，土地都集中在農業家手中。英國實爲大農業的國家。反之，在十八世紀末大革命時的法國，農民的土地已由聖主的貢稅和償付中解放出來了，且已成爲農民的私產。故土地革命過後的法國已爲小農經濟的國家。

在十八世紀中葉，尙談不到解決土地問題的革命路程。能引起土地革命且真正已實行土地革命者是在十八世紀末極厲害地反對皇帝和貴族的鬥爭所引起的。然而在十八世紀中葉，國皇和貴族等階級的力量，在外表上尙不能說是動搖的。無怪乎資產階

級的思想家（和一部份最先進的貴族份子）希望着由另一道路去恢復農業經濟——無須乎土地革命，只消資本主義的土地改良。他們希望和英國一樣，藉助於農庄承租制去恢復農業經濟。施行大農業的方法，把土地集租在富有的農庄資本家手中，仿照英國恢復農業經濟改良農業經濟技術的辦法。英國的先例聳動着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者，都為農庄制的熱烈贊助人。他們熱烈地擁護着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造，首先就須成全庄家和富有的農民——即農村資產階級，或所謂農村的第三等級——的利益。這樣局部的改造要牽連到貴族地主們的利益，他們都擁有其土地的私有權且由農庄家收取租金的。

這種土地改造的宣導者為十八世紀的重農學者，法郎士開納乃創造這學說的首領。重農學者乃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為他們宣導着消滅在農村中的封建制度以及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改建農業經濟之必需性，他們尤其是農業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為他們更注意到指揮農業經濟的興旺和發展。重農學派在其政綱中要求消滅一切阻止農業進步的不利條件。第一，他們兇狠地鞭策着法國農業經濟原始的技

術，且以英國爲例，證明農業合理化的必需性。第二，他們激烈地攻擊祇管培植工業且使農業衰微的重商主義政策；他們主張丟棄減低麪色價格的政策，而要求麪包自由輸出以提高麪包價格。第三，他們提出農業階級完全免除稅賦且把一切稅賦轉使地主負擔的政綱。

這些即爲由重農學派所提出的經濟政策底政綱。且也，爲要證明這個政綱的正確，又創設了一貫的經濟學說，用以解釋整個國民經濟的現象。這種理論的系統——雖其出發點是錯誤的——卒以其偉大的思想和其全部之深遠的推考著，且使這理論的創設者成爲近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底重要份子之一。開納底學說最有重大意義者有二部份：1，論純粹生產品的學說或純收入的學說；和2，論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學說，在其學說的第一部份裏，開納證明着只有農業經濟才能得到純粹生產品或純收入，故農業經濟才能謂爲“生產”事業。在其學說的第三部份中，開納證明只有經常地發展農業才能使整個國民經濟社會再生產的過程，正確地毫無阻礙地進行。顯然地，開納這二部份的學說。和其實際辦法的政

網密切貫連着。開納底學說，實爲證明其復興農業經濟的辦法之正確的工具。重農學派的實際政綱。在事實上是很片斷的，然其理論上的紀念及於經濟思想的發展上則有極偉大的作用。把這些觀念由爲開納所創造的片面且錯誤的形式中解放出來，那是後來的英國古典學派（密斯士和李嘉圖）以及馬克思底偉業和功績。

## 第二章 開納行傳及重農學派史略

開納於1694年生於法國的茉莉村。他底最初的傳略，證明着他是個名家的子弟，然而近代學者差不多都以開納的家世，為小村庄的資產階級。他底父親是個富農，為鄉紳且有各種小小的職司（征收錢糧者）。這小孩子的教育，是無人注意到的：當他十一歲時，尚未上學。長到這末大的他，拿着描畫各種農業經濟耕作的書籍，去消磨他底大部份時間。凡有興味的書本，法郎士開納即請教鄰舍的園丁，很快地學習閱讀。且由此時始，熱烈地酷愛着書本。據說，有時在夏天他由茉莉到40啓羅米特遠的巴黎去購買其愛讀的書，當天即回到村裏去，在途中尚好好地閱讀其購來的書。

1711年，十七歲時，他承母意（這時刻他底父已死了）再到巴黎去隨一彫刻師學習。然而彫刻的藝術，非此青年的志願。因此，又請求母親准他轉到外科醫藥學校裡去學習，在那裡他遂專心致志地研究着

外科醫術。他靜心地聽講演，看病人，沒有一次疏忽過他底職務，此外他還利用暇時去成就他底數學和哲學一般的基礎。

1718年開納獲得外科醫術之畢業文憑且被聘到小小的省城孟特去執行15年外科醫生的事務。開納的聲譽漸著了，而其醫術也更有經驗。且往往受紳士貴族們延聘到郊外別墅去。這些名貴的患病者和庇護者，卒能使開納回到巴黎去。

開納於1734年回巴黎之後，一方面，仍繼續其在上流貴族社會中之醫生的事業。另一方面，他承續其先前所研究的工作且出版了幾種關於醫學的和生理學的極成熟的名著。他熱烈地參加外科醫術學校和醫學專門學校之筆戰。這論戰僅為外科醫學學會和醫士學會間爭論的餘波。那時候外科醫生為後起的醫士，且其地位也低，大約與那時的輔助醫士底地位相仿。按其作用，他們往往被視為和當時的理髮師一樣，除了磨筋刺血而外，毫無所事。有時候，甚至有毫不學習而為“外科醫生者。”醫士們上下一致地視外科醫生乃毫無學識之徒，醫士們褫奪了外科醫生的獨立治病權。另一方面則想提高外科

醫術之教育水平綫，且擴大其治病權。爲此，更應設立外科醫術學校於巴黎。外科醫術學校和巴黎大學醫學專科間之爭，以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辯論最爲激烈，且出版爲擁護各自學會之天然利益的短篇論文和小冊子。開納乃外科醫術研究院——創設於1730年——的校長和教授，故那樣積極地站在外科醫生方面去參加鬥爭。他以其科學的著作和外科醫術研究院的出版物去提高外科醫生的權威。在其作品中，他堅決地堅持着提高外科醫生的教育水平綫和社會地位，使之與醫生相等爲止之必要。

1749年，開納因其在醫學界中和貴族中之上等醫士的聲譽，已被聘爲路易十五所愛寵的有名侯爵波伯耳底經常家庭醫士。不久，他又被聘爲路易十五底醫學顧問，但其主要的職務仍爲療治波伯耳。這種任務固不需要他多大的勞働，然而却很費心計而繁冗。侯爵是個偏窄而任性的夫人，很易召致病痛。在那疾病易發的情況之下，療治爲國王所愛寵的她，雖待人接物如開納那樣審慎而靈敏的醫士，也當加倍地小心。侯爵情不自制地，往往叩問醫士，使她自己能恢復和國王之戀情的方法：“

如能小心於飲食而稍事運動，早可恢復康健了”——開納後來這樣答覆着。在那答言的字句中，充滿着深遠的誠摯的用意和規勸着侯爵去執行他那忠告。雖然，侯爵仍喃喃自語：“我想，醫生是完全對的，但我現在覺得我自己完全不是這樣的。”

開納與侯爵和國王之光榮的關係，與貴族們應酬的榮遇，以及其細心盡責時的謙恭儉約，都使他成為國王之優等的醫士，而提高其理性和人格，國王常以各種高貴的名稱，稱呼開納，且很歡喜和他談話，往往呼之以“思想家”而不名。於1752年且給以貴族的稱呼。雖如此，開納終覺得自己並非貴族之流。苟且而貪戀的宮廷生活，實際上也是籠罩國王的意旨：“雖倒台——也在我後”——是不能引起忠信的開納底同情的，開納底理性是禁迴着貧窮和衰微的法國底命運。當公務之暇，開納又和侯爵與國王述說故事，以及宮廷間之可愛的笑話。然而這些故事和笑話，都由思想家虛擬出來的。開納在宮中有些甚變感觸，可以由下面所引證的，侯爵波伯耳論他的那段話中窺見：“你曉得，開納有一次告訴我些什麼？當國王和開納來我處時，開納是很放

肆的。國王去後，我對他說：‘國王如此優容，爲什麼你在國王面前會那樣放縱？’——‘馬丹！’——他答道——‘我是過了四十年城市的生活，對於貴族世界是沒有甚麼經驗的，於貴族世界很難習慣，當我和國王在一間房內時，我想着：他也是個人，但他底命令能够去掉我底頭。’

解脫了宮廷的酬酢，解脫了繁冗的職務，解脫了競競俱俱的小心，解脫了她那無常的遷怒，開納得到了一小小的房子裡休息去了。那房子即在凡爾賽宮內。在那裡，高貴的醫士——爲了國王按時的召喚，於夜間每清醒着——變成了大思想家，在起草後來振興法國農業經濟的計畫了。在那裡善待賓客的主人，召集了法國的優秀思想家，破滅封建主義和宗教聖主的萬惡敵人，後來勝利的前驅者“第三等級”（法國的）。“百科全書”之著名的領袖季特羅和愛倫貝爾，唯物主義的哲學家葛維支，未來的總統偷爾柯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哲學家和學者，都熱熱烈烈地到開納底房子裡來。正如宮中傳語，社會的靈魂乃此主人；然而在猴子的背上，騎着嚴酷的惡魔。在開納門下的這些朋輩中間，毫無拘束地

交接着論述政治的和社會的惡結果的意見。討論國家現狀，發表各種攻擊朝廷，貴族和教士的宏論。有時候，在那裏甚至可以聽到這樣的意見：法國的情勢已嚴重極了，或者可為強鄰所侵奪，或者會起風潮而自亡。——“最不幸的莫過於生在此時的人們”——且這樣嘆着。這些沈痛的演說至使貴族夫人們發抖，當他們偶爾經過那裏聽到時。然而富有經歷的朝廷是不會給他有多大作用的。他們認為開納不過一簡單的“勿老傑兒”（即不滿現存制度的怪物）而其朋友也不過捏造毫無根據之事蹟者而已。

由過宮中生活第一年起，到1750年初開納底內在生活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活到55歲的開納是以醫士著名而被聘至宮中，除留心其醫術的科學事業外，仍研究經濟上的問題。在幾年之間創設了新的經濟學派，且號召了許多門徒，這些門徒都宣稱開納實為新的，唯一的“重農”學說的先知先覺者。

在開納底科學興趣和事業上之轉變的緣由，不很明瞭，但可以這樣假定，是因開納幼年時即注意農業經濟的情況，且過着農民的生活。開納是由農民間和鄉村中小資產階級中出身的，故這種注意很

能深深地印在那少年底腦子中。又其在省城中從事於外科醫術的實際活動，亦給他不少爲研究城市和鄉村中之相互關係的材料。的確，在省城中的那些材料，又活躍地給富有經驗而聰穎的醫士以個別的研究。在巴黎的生活，尤其是在宮廷中，又廣闊了開納底眼光。繁華的宮中生活，鼓舞着他底沉思而疑慮的動作，這個又給他以一切的認識。開納是很容易窺見那種動力之神秘性的醫士，那動力的神秘性發生於舊政體的國家機體的運用中，而終止在受累於那機體之活動而簡單的滅亡上。認識了當時的哲學家，學者和著作家，共同討論着社會和國家建設的大問題。活躍的經驗之宏富，政治和思想生活底中心地之感覺的豐富，有系統地自然科學事業之成就，以及趨向於廣泛的哲學的研究，均集中在開納一人身上。牠們給他以偉大的理想之可能性，而成了燦爛的理論體系，在那體系中，平心靜氣地研究了集合廣泛的理論總和之周圍的真實性，在那體系中，冗長地統計了虛幻地縈迴着毫無意味的形而上學的想像之乾燥無味的數目表。

把開納底注意力攝引到農業經濟的情況上去的

直接推動力，要算自1750年開始論辯的關於麪包價格和麪包貿易問題的爭論。農民底苦境，施行麪包自由貿易和減低使農民羣衆衰落的稅賦之必要——所有這些早已引起國人們及著作家之注意了。自1700年至1750年時期內，出版了許許多多作品，都證明着由農業經濟衰敗中去培植工業的重商主義政策的失計。著作家於十八世紀初已擁護農民底利益了。即以布其白和伏伐來說吧：布其白自命爲農業經濟的辯護者，且真誠地感受到農民羣衆之受累，和在封建制與皇權之雙重壓迫下而破產。他寫道：“農民底不幸，任何時候都不會像麪包價格低廉那樣厲害了。”想提高麪包的價格，布其白要求麪包的自由出口。爲要證明企圖輸入貴金屬的重商主義政策的錯誤，布其白闡明一種學說，證明貨幣不過是便於交接的小小的作用而已。他認爲以金銀爲財富之唯一源泉是極錯誤的。按他底意思，經濟之當然的目的和真正的財富，乃使用價值。人們已陷入深深的陷阱中了，當他們把經濟奴役的貨幣變成使人物兩敗的苛政時。應終止貨幣的重壓且恢復其奴役的作用。這種後來爲重農學派所採納的貨幣論，很明

顯地反映到因重商主義政策而破產的自耕農農民羣衆，去反抗奢華淫逸的僧侶和貴族，去反對財政高利貸者的壓迫。

布其白所要求的，首先爲抬高麪包價格，而其同時人，伏伐總司令——最有名的軍事長官，礮臺的建築者——則要求減輕使農民破產的重斂。當然，有名作家的著述是不會同情宮廷和貴族底奢逸的，布其白底作品是毫不箴默的，而伏伐當其死那天，在其規畫征收稅則“新法則”的書中，也尖銳地攻擊一切敗壞耕地的劊字手。

布其白底和伏伐底著作都出版於十八世紀初。這種觀念，經過幾十年後爲侯爵亞柴生所更擴充之，他極力排斥重商主義政策，且認爲國民經濟之基礎在乎“農業興隆和國內貿易的興盛”，並非由於追蹤國外市場。亞柴生極端主張自由貿易，“要好好地管轄，應少加干涉。”“我不知道尚有其他貿易法則，除掉完全拒絕貿易底條例而外。”“勿干與”（Laissez faire）——應這樣忠告每個國家當局者。”亞柴生實爲最早提出Laissez faire之有名的說法者，這種說法後來成爲贊成自由貿易者之門

爭的口號。

顯然地，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的思想，這種觀念已成爲實際的要求了。那種要求後來又採入了開納底系統中去（即爲：關於農業之要義及貨幣之次等作用的思想；提高麪包價格之實利和自由貿易之必要的學說，減輕農民稅賦之要求）。十八世紀中葉以前，這種思想僅爲各個思想家所提出而已，且著者往往因此被虐待。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事情就二樣了。農業的退化，工業的停滯，以及農民因重斂和各種苛捐雜稅而貧困都深刻化了，且明確地顯露着舊政體之不堪。法國的社會上已開始了不滿和醞釀革命着的時期到了。改造社會和政府的問題之探討，已爲書籍，雜誌，待客室，國會內之談話的資料了。對於舊政體的批判，又分爲二種意見。第一種，即所謂十八世紀之偉大的先知先覺者，對於跨在封建制，皇帝專制以及天主教三大聯盟上面的舊政體之尖利的批評，他們主張分權去削弱國王的政權（獨裁制）；其他爲最勇敢的，最先進的政治思想家，他們主張把政權歸還國民（盧騷底民約論）。先知先覺者嚴厲地批判宗教的迷信，以及教士的特權（

服爾泰，其特老)。由其特老和亞郎伯爲首的著名的“百科全書”派，彙集了許許多多批判舊制度的著作(即所謂“百科全書”派)。如以大哲學家和政治家是批判舊政體的根基的，那末以討論最無精采的最少的經濟政策問題爲其工作對象的自由思想的小官員和經濟學家，僅起了小小的作用。這些問題很有趣地叢生於十八世紀中葉。尤其引起社會上之大大地注意者爲農村經濟的情況，因1747年和1750年之歉收而更形惡劣。爲要免避歉收後的饑餓，政府由外國購入大批的麪包，且開始創設國辦的麪包倉。歉收和政府的麪包政策之失敗，在廣泛的社會上推廣了消除先前嚴厲地干與麪包貿易政策之必要底信號。關於麪包價格，麪包出口等等問題都成爲筆戰之探討的對象。“1750年末——服爾泰寫道——國民，詩詞，喜劇，悲劇，小說，道德的論著，神學的論辯，都在注意着，且討論着麪包問題。”1750年初出版了幾種關於麪包貿易的著作，即引起了熱烈的爭論。最值得注意的，爲葛百特於1754年出版的著作，這著作要求在全省之間自由轉運麪包，而在某幾種情形之下，則許可麪包出口。往往受

社會意志及作品推動的影響，政府遂於1754年11月17日宣佈：許可在法國各省間麪包自由進出；而麪包輸出則仍在例禁中。

就在那時候，開納底論述經濟問題之第一部著作完成了。很可想見，我們上面已曾指明過開納從事於科學的轉變，極受當時之爭論麪包政策和麪包價格問題底熱烈論辯的影響。1756年和1757年開納在“百科全書”——關於百科全書我們已在上面說過了——上發表了二篇文章：“農莊”和“種植麪包”。此外，他還發表了幾篇論述哲學的文章。然而，不久，開納即退出“百科全書”派。其退出的原因不大明瞭；大概，由於那時，百科全書者已引起朝廷之不滿意，而開納則服務於廷中，隨時都應極其謹慎周到，很能使他不再與已為朝廷裹戴上叛亂的大帽子的百科全書派為伍。然而開納和百科全書分歧的原因是極深刻明顯的，百科全書派乃代表城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早已深信消滅舊制度之必要。百科全書派雖未貫徹其思想，在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當前奪取政權。而百科全書者之社會政策的和哲學的急進主義，則與開納不同其立場。假使城市資產階級的思想

家是爲工業之自由發展而備置道路的；那末開納首先就想復興農村經濟，且在富有庄家和地主貴族聯盟基礎上去改造土地。如果城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說是要消滅——無論如何均應限制——皇權的，那末開納和重農學者均主張不限制皇權，他們希望利用皇權去實現土地改造。總之，百科全書派和當時的其他思想家是提出改造社會和國家之多少有點底層的資產階級的政綱；而落後的農村經濟之保護者，開納，則提出跨在庄家，地主，貴族和皇權聯合體上的極樸素的土地改造。開納底政綱之一半性質，深受他底宗教哲學觀點的影響；他並未染着爲幾個百科全書者所主張的急進的唯物主義。

上面講過了，在百科全書中發表的文章上，極明顯地表明出開納底社會階級性。在那幾篇文章中，開納以連篇乾燥無味的實際事實的材料，和許許多多統計的數目字，去證明法國農村經濟因重征暴斂和由於禁止麪包出口致使價格減低而破產。在這些文章中開納推論着大農庄經濟如何地比小農庄經濟佔優勢，且命令向鄉村中移植富有的庄戶，這些庄戶能以大資本投進農村經濟中去的。並以英國

爲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改造他。

前此，開納僅一人規畫着其觀點，但當1757年其第二篇文章發表時，他與侯爵大米拉婆（不要和在法國革命開始起很大作用的小米拉婆相混，那是他底兒子）會見了。這會見的日子，重農學者認爲是重農學派底誕生日。米拉婆和開納會面了，而會面的結果使米拉婆變成了開納底第一個門徒和崇信者。

米拉婆尙未與開納會見之前，是個極明顯的封建貴族制之擁護者。前此不久，他曾著一本哄動一時的名著：“國民之友”，已續出第十版了。這書使作者獲得極大的聲譽，從此，他就往往被稱爲“國民之友”了。米拉婆在此書中，勇敢地描述在農村經濟中資產階級經常伸張的圖畫。新有土地的資產階級握着廣大的農庄，這農庄吞滅小農的土地有如長矛刺池畔一樣。結果，就是鄉村無居民，和農村經濟的衰落。爲要恢復後者必當終止貴族分種制和鄉村無居民之分化的過程。必應鞏固而恢復小的獨立的農民經濟，重新以許許多多的小農底園場去代替少數廣大而無人居的農庄。

這種無關重要的政綱爲鄉村的貴族後裔所保持

着，但同時，小的農村資產階級出身的開納則提出與此相反的在農庄租種之基礎上去振興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底新政綱。米拉婆認為在農村經濟中資產制之滋生，會使農村經濟滅亡，開納則不然，他以為所以使農業衰微者，是由於施行農庄經濟不充分之故。在法國四分之三，——他激動着說——都是小農經濟，他們使用其赤手和極原始的工具有耕種着，而且勞働過後，由土地上所收穫的結果僅足供其必需的生活資料。如不把大資本投入農業中，則振興農業是不可能的，但在事實上，僅有富有的租種庄戶才能把大資本投進農業中去。“你們應相信耕作自己的土地者並非貧農，…而是富有的人們——你們當允許他土地的開墾和農產品的貿易”。

當然，米拉婆和開納的會晤即為貴族地主底代表和新的農村資產階級之辯護者間的會晤。這二人同樣地都注意着農村經濟的破產，不過用不同的方法去拯救而已。“增多農村的居民”——米拉婆這樣呼喊着；其意即為：在聖主與地主之善意保護之下加多小農的園場。“把資本投進農業中去”——

開納這樣教誨着；其意爲：增植大的資本主義式的農莊經濟。這二種社會與經濟的政綱發生衝突了，結果還是資產階級農莊的政綱佔了勝利。米拉婆想恢復貴人底仁慈和村人底幸運的烏托邦的美夢是不能實現的，因貴人和村人都沒有爲農業合理化所必需的資本。米拉婆曾說，當開納和他解釋這一切的時候，他才如夢初醒，這就證明他那復興農業經濟底貴族式的政綱毫無意義了。米拉婆以其赤裸的眞誠去接受開納底觀點，並且爲開納底忠實信徒，雖非隨時都能正確地施用學生這個字。後來他又添說，在未和開納會見以前，他所注意研究的經濟問題，並不比他底貓多。米拉婆——如馬克思所說——爲開納底門徒，有了這種事實，足夠證明了。他證明，一方面，雖代表貴族僧侶的大思想家也有由聖主——封建的農業，轉變到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農業底過程之必要了。在另一方面，這種事實又證明開納政綱的一半——就是和地主貴族妥協，且使後者贊同的那一半——是適宜的。

開納在和米拉婆會晤後，獲到了極興奮的，善辯的助手，這助手極願去宣傳新的觀點且列入新的

贊助者。馬克思極公平地說，米拉婆和開納以後的其他人們，都受了開納底觀點之有力的影響，而崇信他。米拉婆已爲開納底熱心堅決的信徒了，根據他自己的說話，他已信奉得“發狂”了。米拉婆寫道，他以爲他自己很可羞，其毅力和決心落在他底門徒之後了。真的，因這二派人們之一致宣傳，在他們的周圍就很快地形成了許多其忠信門徒底集體，即社會上所謂經濟學者底中堅，也就是後來的“重農學派”。

法國重農學派底歷史差不多包含着二十年（1757年—1776年）。其中又可分爲二個時期，各爲十年。第一時期爲重農主義理論的初創期。理論的創成，事實上差不多全出開納一人之手。其理論的偉大，使在他周圍的門徒以及在許多有天才的人們間都不能更改之，對於其學說之成就是這樣，對於其學說之發展也是這樣。1758年開納著成了其偉大的“經濟學圖表”，在那表中，觀察社會再生產過程是整個的。下面第五章，我們還得更詳細地來介紹開納底這種名著。爲補充這著作計，開納又作了一部“農業國經濟政策的一般原則”他在那裏提出許多要由國家去改革的辦法。在“經濟學圖表”中開納闡明

了其理論，而在上述的第二部名著中，他又提出經濟政策的政綱。最後開納在這三部名著裡，創造了經濟學說，經濟政策以及社會哲學的壯嚴燦爛的建築，這些建築的總和即組織重農學派底體系。

新的信徒與那理論之創成相應並至。開納底學說吸引了許多人們，其中最著的有：味舍·傑·拉里佛耳，調策·傑·熱母耳，來特蘭和服稻——都是些天才的著作家，其作品多協助着在社會上重農學派底觀點之傳播。與重農學派接近的偷爾柯也極有貢獻且在重農學派間為獨特的思想家。雖然偷爾柯不願把自己算作重農學派（或者如其敵人所謂的黨派）底份子，然而按之實質，他確實有限地修正而承受了開納底學說。

關於農村經濟的經濟和技術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注意。1756年在布萊地方創設農村經濟學社；十年間，在許多省裡，都建設了農村經濟學社和農業研究院。關於農村經濟和國家財政的刊物，一方面，引起討論西米來戰後（1763年）之稅賦的文章，另一方面，則鼓動政府再去執行麪包貿易的問題。我們上面所說的關於1754年所頒布的

麪包在國內自由貿易的法律，實際上差不多毫未施行。各省當局多不撤消其先前所採取的禁止麪包出口，沒收麪包，強迫按價徵稅等等條文。上面我們已說過在 50 年代初這種嚴厲地干與麪包貿易已引起社會之不滿了，到了 60 年代初，那種不滿更加强了。那時候重農學說——開納底學說——已經登台。在社會意志底影響之下，政府被迫得不但承認了 1764 年公佈的國內麪包自由貿易之老法律底實行，還於 1764 年頒佈有限制地麪包出口的法令。在這法令中，政府甚至還申明麪包之自由對外貿易實為“興盛農業——這乃國家財富之主要來源——之最好的方法”。許多歷史學家在這法令的條文中，看到了新的重農主義底觀點之回應，重農主義的觀點已很廣大地傳佈在社會中了。

不久，政府在其擴大麪包自由貿易的企圖當中分裂了重農學派的觀點。1765 年政府創辦了半官的“農村經濟，商業和財政的雜誌”，且聘請調笨傑熱母耳為主筆。當然開納底這個忠實而實踐的門徒，努力以主筆資格，把那雜誌變成宣傳重農主義觀點的機關。重農學者都變成那雜誌的積極參加者了。

，尤其是開納在那裏發表了許多文章。（開納很不便把其著作的活動和其高貴的醫士相混，故其一切作品都署別名或綽號）。此外，爲使吸引讀者注意其觀點起見，開納特轉注於新奇的作品。他僉署別名發表了幾篇批評重農學派底觀點——僅以農業爲生產事業——的文章。那些文章發表過後，開納復不署真名以其名著“商業論”和“手工工人勞動論”去答覆他們。那些前後發表的論辯的文章，原出一人之手筆：開納且很詳盡地說明，爲甚麼他不以商工業爲非生產者階級的理由。

在官辦雜誌上重農學者底文章，引起很大的爭論。反對重農學派的爲擁護商工業資產底利益的經濟學家，他們且都不滿重農學派認爲商工業家乃非生產的階級。這種爭論終於使重農學派分裂了：調笨·傑·熱母耳已於1767年開始退出，且由雜誌的指導者成爲重農學派底反對者了。

重農學派歷史底第二個時期，始於1767年。這一年乃爲有些在散播重農學派觀點的實際上起過大作用的事實之確證。此後重農學者都相率退出官辦的機關報。而印行曆書的僧院長服達，則建議把歷

書改爲重農主義的宣傳工具，重農學者就利用這有利的提議把歷書變成了他們的機關。在 1767 年中，能引起廣大的讀者們所最注意的有二本書，這二本書可爲重農學派的宣言。第一本是調笨·傑·熱母耳的作品，標題爲“是重農學說抑或政府的自然建設最有利於人們底幸福”。其內容概括有些重農學者底作品，其中以開納底爲最重要。所謂“重農學說”者乃要求在經濟生活中實現本乎自由底自然規律（按照希臘文，重農學說即爲自然或自然規律底統治之意）的開納底學說。從此，開納底門徒——他已自命爲經濟學者了——變成了在重農學派底中堅中之最有名者的了。第二本於 1767 出版的書，是墨西·傑·樂·里佛耳底著作，“社會制度”，這書實爲第一次闡明重農主義之整個宗旨的作品。著者特別詳盡地去推闡重農主義底和重農學說底政治的基礎，且著者運用艷麗的體裁和偉大的文學天才，卒使此書哄動一時。

最後，自 1767 年始，重農學者在米拉婆底客廳裏——在巴黎——召集經常的每星期會議，這會議繼續着十年之久——到 1776 年止。牠統一了重農學派

之一致的思想且吸收新信徒。除掉開納底舊門徒而外，在那會議上還有各省的貴族們短期旅居巴黎的，或者外國的使者（爲其政府派來採聞新農學底方法的）來參加。因此在這十年間，重農學說得更廣泛地傳播於社會中。晚飯後，在會議上，米拉婆經常地在宣讀重農學派預備去發表的文章：讀後，即按照在那些文章中所提出來的問題開始興奮地討論，這些會議很協助着重農主義的觀點之傳播，尤其在高等社會中。那些在刊物上和書籍上所討論的觀點，一方面爲夫人們和貴人們在高貴的客廳裏談着，或者爲服爾泰和盧騷所研究；在另一方面爲皇族以至埃鈴榮理第二所注意。

以歷史的眼光看去，那也很平常的，當重農學說風行極盛時已足顯露出牠是沒有其他任何的社會階級的基礎。不利於工業和商工業資產階級底利益的重農學派，終不能實現其堅決的社會改良。法國終於不能避免革命了，在革命中，廣大的國民——其中大部份爲在城市資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羣衆——需求消滅皇權和貴族的特權，以土地改良——即藉皇權和貴族們之助，去完成少數農村資產階級利

益的土政改良政策——的手段去躲避土地革命，終於沒有機會實現了。但重農學者毫不覺到迫在目前的嚴重而迫切的社會的風勢，他們仍固執其建築在皇族上面之改良的願望。然而顯著的經驗已告訴了重農學者，皇族雖暫時為進行重農主義的觀點，但他們不能而且不願意去實行重農主義的土地改革的，因無論如何，土地改良是要消滅封建諸侯制的。以後，我們還要講及當儉爾柯執政時小心地施行土地改良，已引起了貴族和僧侶的反對。殘酷的失望已摧殘了滿望皇權去實行其政綱的重農學者底迷夢。翻開讀一讀皇朝時埃鉛菜理第二之俄史。這皇帝很平靜地以其自由思想的觀點，去召倩米墨爾·傑·爾里佛爾來主編新法律，里佛爾也和相信以說服力和邏輯的論證能開導國皇，且使之相信重農主義底政綱之實利的忠厚的重農學者一樣，向國皇建議且實行之。里佛爾到彼得堡下榻於佔有許多房間的三座房子裏。他在一頭門上，寫着“商業科”，而在另一頭門上，寫上“財政科”等等。總而言之，他自以為是社會改良者，且以前他確曾夢想過做總執政者。不久，埃鉛菜理第二死了，使墨爾·傑·爾·里

佛爾大掃其興，乃快快地回到法國去。

另一方面，重農學者因企圖和皇權勾結，遂大受那時代統治社會的名流，城市資產階級之進步的思想家——先知先覺者們的排擠和輕視。在重農學派和百科全書學派之間有着尖刻而時常對罵的惡感。盧騷極忿恨地斥責重農學派諂媚皇帝“合法專制”之卑鄙。米拉婆贈他重農學派的著作，且聲明以後不再贈送了，他以爲那種羞辱是自取的。服爾太——諷刺大王之一——則譏笑重農學派底稅賦論。

重農學派考察了第三等級之最先進的思想家，即叫之爲自己的反對者，且爲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之直接保護者。上面，我們已經講過開納論商工業階級之“不生產”的學說，曾引起怎樣激烈的爭論，而由於麪包價格和麪包出口問題所發生的爭論更爲激烈，上面我們已說過，當1764年公佈麪包自由出口的法令時，重農學派得了勝利。但不久，這法令即引起不滿意了。1767年是大荒年，故麪包價格昂貴極了，在城市裏且起了麪包缺乏的恐慌。城市廣大的居民都怨恨麪包自由出口的法令，和其鼓吹者——重農學派。這種意見，佈滿在一切重農

學派底敵人中間：貴族，官員，財政借貨者，麪包商人等等。這些市民羣衆之不滿意，往往直接去反對重農學者。1771年，有個襲擊老朽的開納底胸部的刺客和幾個平民中之激憤者想擊碎這個麪包自由出口之保護的可惡的人底胸膛。

這些反對重農學派的襲擊又反映到著作上去。攻擊麪包自由出口最厲害者爲天才的經濟學家格里安（於1770年）和熱蓋耳（於1775年）。往下便知重農學派是想把法國變成輸出麪包，再由外國輸入廉價的工業品底農業國。格里安以發展工業國的觀點——不僅要在國內生產麪包，且要由外國運入麪包——去反對重農學派底政綱。關於麪包出口的問題分成了二個社會經濟的政綱：法國工業化的政綱和法國農業化的政綱。第一個政綱是適應着商工業資產階級底利益的，佔了上風，麪包自由輸出的法令，已於1770年由政府明令取消了。

這些失敗和失望，完結了開納末年的生活。在開納死了（在1774年）以後，重農學派底政綱，又幸而在儉爾柯執政的短時期中（1774年—1776年）重現了。

著名的財政總長，儉爾柯想做一些重要改革。

他恢復了國內的麪包自由貿易，雖暫時地——顯然地，其目的，是在減弱其敵人的攻勢——仍禁止麪包出口。且發佈了廢除行會制又解放了工匠的法令。最後，他又以國內的釐金法代替使一切土地主——小貴族也在內——衰敗的貨幣貢稅。儉爾柯的改革又引起社會反動的份子（有特權的貴族，僧侶，財政借貸者）之極不滿意。改革的執政者和其反對者間的鬥爭，結果又使他辭職。專制的君主和地主階級表示了他們自己無力去進行社會改革，法國就很快地暴發熱烈而壯嚴的大革命了。

儉爾柯的倒台為終結重農學派之特殊的社會階級的最後失敗。重農學派底實際政綱之終了，即證明其命運的根基和判定其理論的觀點。在那長時期之最後十年，已給懶漢和好閒者以深刻的笑柄。迨至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才說出含着夢想的形式和錯誤的重農學派實有偉大科學的功績。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又為重農學說復興時期。細心地研究其理論的觀點去證實馬克思對它的高崇推許，且判定現時所崇奉為政治經濟之始祖的並非亞丹·斯密士，而應屬之開納了。

### 第三章 重農主義者底 經濟政策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看到十八世紀法國的農業經濟極受累於下面三種原因：1，由於生產率的低下；2，由於麪包價格的低下；3，由於橫征暴斂。爲要消除這三種使農業經濟衰敗的原因，開納期望國家當局者採用三大辦法。爲要提高農業底生產力，他策畫着以農庄式之大經濟去替換小農和貧農的經濟。他要求取消偏面地仰賴於農業經濟去培栽工業的重商主義政策，爲的想提高麪包價格。最後，要使業農的庄家免去了橫征暴斂，他鼓吹着把一切的稅賦都由地主去擔負。試把這三種辦法分別研究之。

#### (1.) 土地改革

開納揚言着，小農經濟的特點爲小的生產量。清希者農民和分種的農民都不能充分地有爲改良其經濟以及其獲有豐裕的肥料所必需的牲畜。農民使用極原始的工具耕種着，由其勞動的結果，僅能養活

其自己。土地的收成率已低到極度了，而國家也往往值到飢荒和歉收。“極可憐地生活着的分種的農民，因耕種不理理化之故，其所獲得的生活資料，甚至不敷國內貧民的家計。生活資料而外，毫無”純粹生產品”可言，且很難獲得農業家自身的資養料，小農經濟真不中用。

當重農學派給法國一幅小農和破產的農民經濟的圖畫時，他們又看見當代的英國則很快地發展着大農庄經濟，且農業理性化的施行又協助着農業經濟之飛快地興旺。真的，那時候的英國已過渡到新的土地耕作之極發達的時期了。在落後的每年三種法的立場上，已換上了每年換種法了，農業主人們努力着增加牲口的數目而提高其質量，俾其有給與廣大地利用肥料的可能。廣大地備置牲口的欄舍和飼養料，且推廣了農業技術的耕種法。在英國，許多大農業家和富有的庄家都握有豐富的經濟且採用了合理化的農業和牲畜飼養之新方法。熱烈地醉心於英國那樣的合理化的農業者乃重農學者。他們仔仔不捨地去提高“大的富的且係科學的耕種法”他們利用這種耕種法去反對落後農民的“渺小的耕種

法”。

雖說英國之採用了新而較優的土地耕種法相應地使大農庄經濟取償於小農而興盛。然而爲要使牲口健全而擴大，爲要使用技術種植法，英國的農業家或大農庄家必需由瑣碎而陳舊的公共規約中解放出來，這種規約使農業家屈服於強制的播種法制，且給農民以“放畜權”——即於秋季飼養牲口於地主和農庄家底土地上的權利。那時候，地主和庄家的土地均須受強制的播種法制及其他不能使農業合理化的傳統的公共秩序，故新的土地耕種法之採用，相應地發生了大土地所有者和農業家之反陳腐習俗的鬥爭，土地所有者和農業家都盡力把其土地和其周圍的農民底土地圍隔起來。“周圍”其土地，爲的是要干與農民們在那裏牧畜；他們往往把大部份牧場，采地，荒邱，森林和治地都掠取在自己的手中，因而農民的境況益見困苦了。

重農學者並未把其注意轉移列反面去，大農庄經濟之採用把廣大的農民羣衆驅之於新的農業秩序，有時甚至因富有的農庄要吞併其土地而迫之到最低的地位，重農學者狂喜着農業經濟收成率和生產

率激增的前程，且默地裏要求以大農庄去代替小農經濟。“爲耕作麪包而預定着的土地——開納說——應盡量把大部份都集中起來由富農去經營。因大農業的企業比之小農業成本小，耕費低而純粹生產品則大大地增多了，無數的小農是無裨益於國民的”。這種希望施行大農經濟的意見，毫無例外地由一切重農學者傳佈着。比如鐵郭——開納以後最著名的重農論者的代表——說：“出租土地的方法（即大農的形式）是很有利於一切其他私有財產者（即土地所有者）和農業家的；他確定了任何地方——只要有富的農業家——都能投以開墾的最初需費；因富的農業家能投入土地中以較多的勞働和較豐的肥料，故能收穫偉大的收成而增加土地的收入”。

如果重農學派底草案真能實行，則法國將變爲大的富的農庄，使用僱工耕作之最有名的國家了。這種大農業經濟在英國已廣大施行了，英國大部份的農民都沒有土地了，其中一部份變成了工廠的工人，跑到城市裡去；還有一部份變成農業經濟的僱農給富有的農家耕種。這種喪失土地的農民，在法國也會

發生的，果真重農學派底土地改造案能够實行。土地所有者逐漸地吞併了清希者農民和分種農民的土地，且把牠出租給富有的農家，這種農家是能提高農業生產率而支付高度的租金。富農有很多稔取土地且把牠租給農業家階級的機會。貧窮的農民等級則變成了無土地的農村經濟的僱農。在地主和其清希者農民以及分種農民間的封建式的關係被破壞了，在農村中封建關係之最後餘燼已消滅了，和各種封建殘餘密密相貫的落後農業，已爲基於完全受着在鄉村中之資本主義關係所統治的理性化的農業所排擠而代替了。然而這種能使農村經濟生產率抬高土地改造案會把廣大的農民群衆變成無土地的無產者。

然而，重農學者並不顧慮這種農民無耕地的前途。他們底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農業經濟生產率的問題上面。他們毫不遲疑地主張把妨害施行振興農業的新方法之一切封建的和習俗的法規，消除盡淨。他們很深刻地宣傳着以資本主義的農業去代替封建式的農業。他們不能夢想到勇敢地推翻封建貴族的土地，且把一切土地都轉給農民的土地革命。這種土地革命會局部地真實地引起1789年的

法國大革命，也非重農學者底想像所能預料的。即使他們能預料着革命的可能，而爲農村經濟資產階級的和大農庄經濟的思想家的他們，也要以這革命爲有害和可怕的，因她會遺存着小的及不理性的小生產的農民經濟。重農學派生於貴族們在法國底社會政治生活仍佔極大作用的時候，施行違背貴族地主底意旨的資本主義式的土地改良，會使他們大不滿意。他們遂去尋找在其土地改革的方案中有利於地主的其他出路。因此他們就爲地主去保持對其土地之完全的且無限制的權利；他們努力規勸地主們說，能以大資本投入農業裡的大農庄家，是能支付他們以高度的租金。他們下令在農村經濟資產階級的利益上去施行土地的改革，但他們又努力證明這種改革是極有利於地主（因增高了租金）和皇權（因可以加重富農的稅賦）的，開納說：“農庄的數目增加，小土地所有者逐漸地被淘汰了，然而私有財產者（即土地所有者）底收入和稅賦則與由富有的農業家所耕種的農業生產品成正比例地增加了。”

故重農學者，在其土地改革中又宣傳着“土地

和資本聯合”——沿用某作者的習語——或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農庄階級相結合。把資本投進農村經濟中去——這就爲重農學者所進言着的主要任務。開納說：“政府比之人民更能使鄉村很快地富起來，有了財富，人們什麼也不會缺乏了；然而沒有財富則一切都僵了：土地將失其價值了；國家也要深感到沒有財源，沒有力量了。”開納所以斥責重商主義政策者，因她阻止了資本投到農村經濟中去。一方面，重商主義政策減低了麵包的價格因而減少可以轉投到農業中去的資本。在另一方面，以國稅作押向高利貸者借債，給工業以獎金，勉強地去培植工業的政策之實際的制度又使人們底財富分散到工業，財政，投機商業等地方去。爲要把資本由工商業範圍中退出來，再投進農村經濟中去，重農學派又要求撤消了偏面的重商主義的政策。他們要求提高麵包價格，爲的要使於人們最有利的專業——農業，可以獲得一定的利潤，再把他變成資本。爲此，重農學者又想保證農庄家投入土地中之資本的安全和神聖；他們要求免除農庄家的土地稅賦和其他許多雜稅）——這些稅賦都會使小農衰微了（例

如，過關稅，兵役稅等等）。說：“開納必需實現農業自由投資之毫無危險和農村經濟‘生產品’貿易之完全自由。不然，則唯圖私利的富有鄉民，都將把其投入農業中的財富抽出來，再投到城市裏去；其目的，是想利用無智的政府偏袒地給與市民——這因為那些市民所極希望的——的特權。”重農學派毫不倦怠地，熱烈去反對重商主義之“由農業中抽出財政，剝奪為改良土地肥質，土地耕種法等所必需的鄉村財富”底辦法。

再來說明重農學派很錯誤地以反對一般資本主義經濟觀點去反對重商主義的政策。不要以為重農學派是誇獎與資本主義的工業相對立的，家長式的農業的。重農學派的思想並非半自然式的家長式的農業，而是為市場（甚至於為出口）去生產的農業的商品，和籍僱工去耕作的富有的農莊——資本主義組織。當他們說土地才能使人們獲取“純粹生產品”時，因他們只看見能蕃殖資本的土地；故開納說：“農業國底收入的唯一來源為“土地”和投入農業中去的“經營農業者底“資本”即建立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的農業，苟藉助於投入農業中去的資

本，則土地本身是不能生產純粹生產品的。故“雖最肥的土地，苟無為耕種土地的生產成本所必需的財富（資本），也將毫無所值。”顯然地，重農學者不光誇獎能使農業家獲得超乎其耗費在農村經濟生產過程中的成本以外的餘額或“純粹生產品”的自然物品的博厚。據他們的意思，為要起用睡在土地內的自然物品的力量，必應把資本投到土地中去，廣泛地的資本底供給為提高農業生產率之必需的條件。

故重農學者極誠懇地去注意研究資本的作用，尤其是投在農業中之資本的作用，且仔細地去分析當時的資本。然而重農學者底注意偏面地專向於能提高勞働生產率的資本之技術的功能。故他們分析資本，僅及於物質——技術——方面，而在廣義上說，即為生產手段的總和。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是商業佔優勝且，資本才萌芽的時代。故著述十六——十七世紀之資本形態的重商主義者，以資本，即是能產生利潤的某定量的貨幣。開納已批評過重商主義者把資本和貨幣混合的錯誤。他不怕麻煩地重述着，資本并非貨幣本身，而是用以購買能提高勞働生產

力的生產手段購買力。“只要一去參觀農庄和作廠——開納說——你們即可看到那些昂貴耗費底基金是用甚麼組成的。你們將看見房子，牲畜種子，原料物及其他一切動產和工具，毫無疑義的所有這些都由貨幣買來的，但他們本身都不是貨幣。”偷爾柯也同樣說道：“成本愈多愈能完成和推廣土地之種作，必需有牲口，耕種的工具，牲口的宿害，和堆棧等等。此外，還須由收穫中去償付且款待適合於耕作範圍的那些人”。

所以重農學派和古典學派（亞丹斯密士和李嘉圖）都不明白資本的概念是由二個不同的社會階級——資本家底階級及僱工人階級的——特殊關係去決定的。他們不懂得資本的概念即在乎人們間的生產關係，——這是由馬克思所發明出來的科學的概念。『他們僅知道資本底“國民經濟的”概念，僅知道資本的概念，即為生產手段的總和。這種至今尚統治着資產階級科學的資本概念，完全埋沒了後來為馬克思所發明出來的資本之社會性。然而，比之把資本和貨幣混同的重商主義者，則重農學派底學說已大進步，他們已把研究的中心由交換

過程中移到生產過程中去了。

## 2. 自由貿易

農村經濟，不光受累於低度的收成率，且也受累於低度的麪包價格。爲使工業能得到廉價的手工勞働，就應減低麪包價格。因此法國政府卽下令禁止麪包出口。麪包在國內貿易也應受極嚴厲的限制。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了，政府想保證城市裏的麪包，——尤其是巴黎——就以許多極苛刻的法令去限制麪包商人，禁止麵包由某省自由轉運到別省，強迫農民在城市的市場上出賣其麵包等等，所有這些辦法，都引起麵包價格之尖銳的漲落，當然，在那時候還是在低度的水平綫之周圍的。另一方面，重商主義政策又勉強地提高了工業生產品底價格。各個工業家都，有某種商品底生產獨佔權，當然，利用這種獨佔權，無非要持續那些生產品之強制的高度的價格，由於舊的獨佔的行會之一致的動作和大工業家底新壟斷遂使在工業品底和農業品底價格中間發生尖銳的歧離。這種價格底分歧，即現代人所謂的『剪刀形』；重農學派想消滅之：他們思提高麵包的價格而減低工業品底價格，

因此重農學派遂草成了論述提高麵包價格對於國家實利的中心的學說，往下便知，重農學者認為只有農村經濟才能獲得『純粹生產品』，即超乎在生產過程所耗費以上的純粹餘額。工業所獲得的生產品僅及恢復在這生產品生產中所必需耗費的數量。要想增加國內的純粹生產品的總量，就應用種種可能的方法去擴大農村經濟，雖至縮減工商業也所不惜。重商主義者是想把法國成爲第一等的工商業國，而重農學派則認爲發展農村經濟——這是法國底廣大羣衆之基本事業——於法國最爲有利。他們想把資本由商工業中抽出來轉投到農村經濟中去；因此即需抬高麵包價格。這樣使農村經濟成爲最有利的事業，且應把新的資本投進去；因而『農業成本的基金』加多了，純粹生產品也增加了，再生產範圍也擴大了，國內一切經濟都能大踏步地向着發展，興盛的前程走去。

由開納底提高麵包價格底學說中，又得出了他底經濟政策之基本原理：『國家不當減低食料和糧食的價格』，『只有提高價格，（農業生產品的價格——魯平註）在農業底成就的協助之下才能保證和

持續國民和國家底財富——這就是經濟科學的精髓。』因禁止麵包之出口，遂降低了麵包價格，致開納堅決地要求麵包之自由出口。爲法國去尋找麵包價格比農業的法國國內市場高些的麵包市場——這個就是重農學派的任務。因而他們進行堅決地去反對禁止麵包出口的重商主義者的。重農學派堅持，『自由貿易』之開始，即爲麵包之自由出口。至於說到危害農庄階級底利益的麵包自由進口，開納則偏袒地要限制之，僅允許當法國荒年，麵包缺乏時，才得准許。故開納主張自由貿易，均緣他有利於農村經濟。開納底門徒對於自由貿易的口號，才有廣泛的絕對性，且他們往往重述自由貿易之有名的新公式：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這公式譯成俄文，即爲：讓我們自由行動。

重農學派不光想麵包自由出口，去提高麵包價格。他們又企圖使有利於農庄階級去造成兩相對峙的“剪刀形”。所以他們不光想提高麵包價格，並且還要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故他們還要求從工業國——例如英國——輸入廉價的工業品，去破壞地方工場和行會行東的壟斷，這種壟斷是昂貴生產品的

價格；頗不利於其生產品的消費者——農業家的。重農學派，不怕價廉的外國工業品的競爭，會破壞了法國的工業，起碼，也要沮滯了法國工業的進步。他們甚至歡喜縮減法國的工業，且仰賴她去擴大農村經濟。“農業國，應以手工勞動生產品——這種物品，可以很有利地由外國購得——之入超的對外貿易的方法，去庇護原料之出超的對外貿易。”以高價到外國出賣麵包，再由外國購入廉價的工業品——這就是重農學派對外貿易政策的觀念。很易看出，這種觀念，是由農莊階級的利益所推動出來的。

至於國內貿易和工業，則重農學派允許在商人和工業家間完全自由競爭。他們希望以完全自由競爭去替換一切行會的和重商主義的獨佔，可以推動工業家和商人拋棄一切使農業家階級担負過重的利潤。商人和工業家間之相互的競爭，使他們的利潤減低到他們底生活資料所必需的水平綫，而其工業品的價格減低到價格之“必需的”——即回復工業家（和商人）的生活資料和生產成本費所必需的價格——水平綫。重農學者要把麵包增到“很好的”價格（統治世界市場，且於回復一切生產成本費之外，

還能獲取純粹收入的價格)同時，他們又想把工業品按其“必需的”價格(即僅能恢復生產成本和工業家與商人之生活資料的價格)出賣。這種由農庄階級利益所推動出來的重農學派底要求又反映到重農學派底理論中去，反映到他們底價值論和利潤論中去。重農學者認為工業生產品底價格是不會超過其“必需的”價格——即生產成本費。其意義即為工業家出賣其生產品不應獲取任何純粹收入(正確些說，即為利潤)，僅可獲取為他們自己和其家屬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工業家和商人底利潤，不應高過為其生活資料所必需的。重農學派底這樣的利潤論在實質上，是否認了利潤的範疇，且不瞭解利潤在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中之作用。

顯然地，重農學者實為商工業自由之熱烈的擁護人。“重農學者即為”Freetrader”(這字由二個英文字拼成的：“Free”即自由，和“Trade”即商業(即自由貿易的贊助人)。重農學派以“神聖的自由，應看做一切人們權利的總綱”去解釋自由貿易。他們要求廢除政府之瑣碎的庇護，這種庇護在重商主義政策施行時代，真實地去干涉一切零碎的

經濟生活。據重農學派底意見，只有某種經濟生活有害時，才用得着政府的干涉。讓政府去尋求為經濟“自然法”活動底廣闊的場所吧，重農學者則以為這場所，即是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底法令。

攢斥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重農學者實為深入於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先進的資產階級的學者間的“自然法”底贊導者。在反對舊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推動新社會結構的思想：在這種新社會結構的思想中，他們看見了合理的，公正的“自然秩序”。資產階級的思想，以為一切封建基礎，都是由某國家底“積極的”法權規定出來，實則違反了合理而恒久的“自然法”的有害的基礎。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先進的思想家所意思的“自然秩序”終竟是怎樣的呢？其本質為他們要把資產階級社會結構由封建殘餘中解放出來。滿足其自然需求的人權，自由權（即解放農奴），財產私有權（即把私有財產者由封建貢稅和限制中解放出來），以及商工業之自由（即取消封建式的和行會式的限制經濟的行為）——這些即為資產階級

的思想所要求的最主要的個人“自然法”。

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重農學者所提出來的商工業自由的政綱完全和其論“自然法”的哲學學說相和合的。重農學者，舉起恒久而合理的自然法的旗幟去要求取消干與經濟生活的重商主義政策。但如果我們以為重農學者底自由貿易的原則，僅由其“自然法”的學說中推演出來，那就錯誤了。英國古典學派的代表（斯密士和李嘉圖）仍於自由經濟活動中保持着“自然法”的學說，雖然，他們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完全和重農學派不同的。重農學者首先努力於麪包之自由輸出法國去提高有利於農庄階級的麪包價格，而古典學派則把有利於工業資本之廉價的外國麪包自由輸入英國，且又為工業的自由貿易之熱烈創導者，而重農學者則為農業的自由貿易——即專利於農村經濟的自由貿易制——之熱烈導者。固然，在後期資本主義時代，我們往往看到農業的保護貿易政策，即經營大農業經濟，為減弱國外廉價的麪包和原料之競爭計，提高農業生產品之入口稅。但在初期資本主義經濟時代，不光是法國，而且其各他國（例如，日耳曼和俄國）

也都爲由農業的自由貿易觀念所統治着的產植麪包的國家。不過這種農業的自由貿易觀念底代表，在法國卽爲重農學派而已。這例子很可證明，由各種不同傾向的代表所推考出來經濟政策的原理，與其用創設者底一般哲學的觀點去解釋，毋寧用爲他們所擁護的那社會集團之階級利益去解釋更爲確當些。

### 3. 稅賦政策

我們已分析過屬於土地改革和貿易政策範圍內之重農學派底政綱了。重農學者把其土地改革，當作提高農業經濟生產率的手段。其自由貿易政綱的目的，是想提高麪包價格，但法國農村經濟不光受累於低度的農業技術和價廉的麪包價格；且極受累於過重的稅賦和聖主的貢稅。要使農庄階級免除這層痛苦，重農學者又提出稅賦改革之特殊的草案。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知道，農業家往往於付納租金和稅賦而外，很難剩下爲其生計所必需的麪包。在這種條件之下，富庶的人們誰都不願去租種土地，把其資本投入農村經濟中去。想把資本投進農業中去，就應保證農庄家出納租金和稅賦的總和不超過“純粹收入”的總量——即除出資本之回復數量

和其利潤以外的總量。這種保證的要求即爲重農主義之稅賦的學說。

據重農學者底見解，必應保證農莊家全部資本之完整，和相當收入（利潤）之取得。農業家於收回其生產成本費（重農學者不光以農莊資本爲生產成本費，他們並把農莊家所獲得的利潤——據重農學者的意見，這種利潤僅爲農莊家及其家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也當作生產成本費。）以外，所得的全部純粹收入，都以租金的形式落入地主手中了，故農莊家已毫無餘額或‘自由的’基金可供國家以稅賦的形式去榨取了。稅賦應由純粹收入——即地主所獲得的租金——中去支付。應取消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稅賦而以由地主的租金中去徵收的單一稅來代替。這種由重農學派所提出的單一稅的草案，又得到急進的資產階級之改革者的贊同。馬克思說，十八世紀，法國這種勇敢的草案，實無異於‘局部地沒收土地的私有權’。這種草案的意義就在乎取締了貴族們的稅賦，因單一稅應由一切土地所有者——貴族也在其內——去完成的。

重農學者底稅賦政綱之最主要的目的，在乎保

持農莊的資本，不至為稅賦所侵入。一切稅賦，只要是不由純粹收入中徵收，而在農莊資本中徵取至減少農村經濟資本都不能在原来的規模下進行再生產過程，且使農業家和國家頻於破產。無論誰，都不應抽富有農莊家的稅。國家對於農業的需費，應當看做神聖不可侵犯的基金；這種基金必應為稅賦之收入以及國內各階級之生活資料而細心地保存着；不然，用強奪的手段去徵收稅賦，會很快地使國家破產。在經常進行再生產過程的利益中，農莊資本之神聖不可侵犯——這乃是重農學者在稅賦範圍內之主要的要求。

初看去，可以說，為農村經濟之保護者的重農學者，應努力於不由地主處徵收稅賦而向商工階級徵收之。然而，我們已知道重農學者要求採用由租金裏徵收的單一稅，即就完全免除了商工業者之一切稅賦。那初看去，重農學者之不明顯的結果乃為由其純粹生產品的學說之粗暴的邏輯上的結果。至於重農學派有純粹生產品的學說，我們以後再較詳地去研究牠。根據重農學說，商工業是不能產生甚何純粹生產品（純粹收入）的，故他們都為不

“生產”的事業。商工業階級只能保持由農村經濟那裏得來的生產品，故徵收商工業階級的稅賦，必不等地會提高工業品的價格。而工業品的消費者仍為農村居民。所以，向商工業去徵稅，即間接向工業品之消費者，農村居民——尤其是農庄階級——徵收的。致重農學者為了完成農業階級的利益而要求完全免除了工商業者的一切稅賦。

## 第四章 純生產的學說

我們已知道了，開納草成了應在資本主義式的農莊租種之新基礎上去復與法國底農村經濟之辦法的一切體系。那種特別偉大的結構和各方周至的經濟政策底系統，已足表明開納思慮之深刻和其兼顧整個國民經濟之一切現象的天才。開納誠不愧爲一個最偉大的經濟家——理論家。開納並不以草成經濟政策之新創的系統而自滿，他努力於創設在這種系統下之經濟理論的根基。開納企圖證明他所草成的一切辦法，都是由國民經濟的理論——他把這理論保存其著作中——所推求出來的最壯嚴的邏輯上的結論。那種爲開納所首創出來且爲一切重農學者所承襲的理論，卒使開納成爲一主要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之創造者。

開納以前之著述經濟問題的重商主義者——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往往探討在那時代最能引起他們注意的各種日常生活問題。他們並不探討贊同或反對國家當局者所決定的辦法之理論問題，他們

所研究的並非經濟理論問題，而是經濟政策問題。其中只有少數人（例如，皮耳·白耻，勞働價值論的創設者，）才去研究理論問題，但其中大部份都不去分析各種理論問題，且也不造就整個國民經濟的理論。開納才以其偉大的天才，去討究包羅國民經濟之各方面的廣大的總體，發明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機體的經歷，即爲開納底大功績。這種經歷極明白地在其二部份理論的學說——1. 純生產品（剩餘價值）的學說；2. 社會再生產的學說——中表現出來。

我們已知道，開納底一切努力，都想把資本由工商業中抽出來，轉投到農村經濟中去，去復興後者。且把他重建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爲要証明由他（開納——譯者）所定出來這些辦法之正確，開納遂創立其只有農業才能獲得“純生產品”的著名學說。照開納底學說，農業乃爲“生產的”事業，因農業生產品不光能回復耗費於農業生產中之一切生產成本費，且能獲得許些餘額“純生產品”或“純粹收入”，給與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即由此去支付的。工業爲“不生產的”事業，因工業品的價值並不大於其生產成本費，不能獲得任何純粹收入或租金。同樣

，商業，自由職業，職員的勞働等等都爲不生產的事業。只有農業才能回復財富，且能創造新財富。

這種論述農業之例外生產的開納底學說，又分爲二重性。開納有時說，只有農業才能獲得“純粹收入”，才能獲得超乎生產成本費價值以上的交換價值，有時候他又說，只有農業才能獲得“純生產品”才能獲得超乎爲農業所必需的資養料的數量以上的消費品。換言之，由於農業之例外的生產，重農學者遂以爲農業有獲得價值之餘額總量的特性，有獲得物質生產品之餘額數量的特性。第一種說法是重農學派承認了交換價值，而第二種說法，又承認了使用價值，或自然物品。農業的價值生產，遂和土地的物理生產相混同了，這混同又使重農學者底一切理論帶着淆亂而矛盾的性質。

上面所指出的交換價值和自然物品之混同是由於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農村經濟——半自然經濟的殘餘，仍佔極大的意義——之前後的條件所反映而來的。然而爲市場而生產的農莊階級之代表的重農學者所注意研究的，首在爲農業家所獲取的生產品底交換價值，並非使用價值。他們又研究在各階級間

之採用貨幣形式的關係。他們假定着，農莊家把其大部份生產品運到市場上去，出賣牠，收回了一定的貨幣總量；他們又假設着，農業家們以貨幣的形式把租金償付土地所有者。最後土地所有者還是以貨幣的形式去把賦稅完納國家。想使這些貨幣形式之很流暢地運行，即需農業品照有利的“好的”價格——農業不光能使農業家收回一切生產成本費，（其中包括着農業家的利潤）且使他還能獲得餘額，俾能成爲租金的性質，用以納給土地所有者。只有農業才能獲得租金，土地所有者底收入由此取得，而國家的稅賦也是由此取得的。故土地所有者和國家都利於盡可能地去增加租金的總量，但想增加租金的總量，即需要增加農村經濟的範圍，即因此而縮減工商業也所不惜。

爲使國家當局者信服取償工商業去培植農業之必要，開納不憚煩地，證明只有由租金中，才能獲得土地所有者底收入，和國家的稅賦。因此開納又證明租金和“純粹收入”（剩餘價值）乃同一東西。他認爲只有地租，才爲超出耗費在生產品生產中之生產成本費的餘額。至於爲農業家和工業家所

獲得的利潤，開納認為僅足夠農業家和工業家底生活資料而已。故他認為利潤並非在生產成本費以外的餘額，而是加入必需的生產成本費中的一部份。換言之，開納埋沒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農業底或工業家底）為剩餘價值之一部份——這是非常重要的——的事實。他以利潤為必需的生產成本費之一部份，故開納遂以地租為剩餘價值（純粹收入）之唯一形式了。且也以地租為剩餘價值（外加利潤）之一部份，故開納遂簡單地把地租和剩餘價值混同了。開納藉此混同，求得農業獲取租金之不能爭辯的事實，又由此得到只有農業才能獲取“純粹收入”（剩餘價值）的結論。農業乃純粹收入（剩餘價值）之唯一的源泉。只有他才能獲得超出生產成本費（其中並包括利潤）之回復以外的剩餘交換價值。

然而，這裡在開納底面前就橫梗着極困難的問題了。究竟怎樣去解釋只有農業才能獲得純粹收入（剩餘價值）的奇異事件呢？似乎可以由農業的特性去解釋農村經濟之價值生產率的提高。似乎可以由農業和工業之創造滿足人們消費所必需的物質生產

品之不同的特性，去說明在獲取純粹收入(租金)的意義上之農業與工業的區別。在農業過程之人們底勞働，能獲得博厚的自然物品之助力，這助力能創造新物品，能創造比以前更多的物品。工業不能組成比她由農業中所獲得而備製的原料物品更多的物品數量，她只能把那種物品(原料—譯者)變成別種形式。土地能生長新的樹木，木匠能把已有的樹木做成別種形式，照開納底說法鞋匠的工作“能使原料做成某種形式”；這是“形式的簡單生產，而非財富的現實生產。”工業是把原料(例如，樹木)的價值和工匠(木匠)之生活資料的價值聯結起來。製成的工業品(例如桌子)使為原料物品，和生活資料——在這種生活資料，在尚未為工匠當作自己的財富以前，早已由農業造成了——之聯合結果。工業僅能生產“複述的財富”；農業才能創造“增多的”財富，“實現增加”那種物質。某意大利的重農學者更明白地說明了這種區別點：“給廚子一定數量的豌豆，他應把那豌豆給你煮成中飯。他把煮好的膳食，給你排在桌子上，但數量則仍是你給他的那些。假使你把同數量豌豆給園丁，

他把那碗豆植在園中，稍經時日，他給你的豌豆，至少要四倍於你給他的數量。這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生產”。

總之，能獲得純粹收入（租金）之農業的特性，是由土地之物理的生產率中推究出來，是由能創造超過農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以上的“純粹產品”之特性中推究出來的。假使農業家在其工作時，共吃了一噸半麪包，而在同一時間內，他在那博厚的自然物上的勞動之結果，則獲得了三噸麵包。這一噸半麪包的價額適為可以給社會上別個階級之滋養品的“純粹生產品。”農業固不光為物品的來源，且為一切人們底生活資料之唯一的泉源，就是說農業不光製造農業者之生活資料，且為社會上一切其他階級製造生活資料。“農業者底勞動，且只有他才不光產出為他自己所消耗掉的生活資料，且產出了為一切其他消費者所消耗的生活資料。”這裡可以得到農業家階級之最主要的社會財富的結論，這種財富“任何時候，都能在其勞動之成果上存在着，而不能自給的不生產階級，無論如何都不能保證光藉其不生產的勞動而存生”倘使不由農業家獲得生活

資料。

我們已知，工業階級是由農業階級處獲得生活資料，故農業階級應把工資給工業階級，即給工業階級以必需的生活資料。農業家形成了支付工業居民之勞動的階級；後者“生存在”農業階級所給與的“薪俸”上。農業實為工業底“寄主”，工業底“內容。”

開納底運用思索的進程，大概可以分為下面幾點，其中每點都為農業的特性：

- 1, 農業乃租金（即除出生產成本費以外之生產品價值的餘額，加上農業利潤）的根源；
- 2, 農業乃純生產品（即為生產成本費以外的生產品價值的餘額，其中且包含着農業利潤）的根源；
- 3, 農業乃分配於社會上，去滿足社會的其他份子之消費的新物質的來源；
- 4, 農業乃純生產品（即除掉耗費在生產過程中之生產品以外的農業生產品的餘額。）的來源；

- 5, 農業乃超乎農業家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以外的多餘的生活資料之源泉；
- 6, 農業不光爲農業家之生活資料的源泉，且爲工業居民之生活資料的源泉；
- 7, 農業又爲支付工業居民之勞動底工資的來源。

總之，在重農學者看來，只有農業才是生產的事業，工業和商業均爲不生產的事業，但這並不是說，重農學者認爲工業和商業爲無用處的事業。恰恰相反，他們認爲必需把原料改製爲工業生產品，所以他們認爲工業是很有用的。他們又承認某國的生產品和別國的生產品交換之必要，也和在某國內各種生產品之互相交換的必要一樣重要。因而他們不否認商業的實用。當重農學派說工業爲不生產的事業時，其意義在乎：工業不能生產任何超乎爲農村經濟早已創製成之外的新物品，不能獲得超乎在農村經濟中早已創製成的價值以外的任何純粹收入（剩餘價值）。當然，重農學者並未撇開了工業生產品的價值是超過了爲他所備製的原料的價值這個事實，例如一隻皮鞋值17盧布，而做皮鞋的皮料則只

值5盧布。顯然地，工業者(皮鞋匠)底勞動於農業經濟原料(即皮料)的價值上，添上了10盧布的新價值了。重農學者爲解釋這種和其論述不生產的工業的學說不相衝突的事實計，他們又有以下的說明。皮鞋匠由農村經濟裡所獲得的不光是價值5盧布的原料(鞋皮料)，且得到了在其工作時所耗費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值10盧布，故皮鞋匠應於皮料價值之外，添上了10盧布的價值。這並不是爲工業所創造出來的新價值，這不過他把在農村經濟所已創造出來的生活資料變成了價值形式而已。皮鞋的價值不能高於原料底和生產於農村經濟而耗費皮鞋生產中的生活資料底總價值。可知，重農學者的理解是建築在錯誤的基礎之上，以爲工業的收入是不能多於工業者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認爲工業是沒有利潤——就此字的狹義上講——的，所以工業不能創造剩餘價值，下面，我們再詳細地研究重農學者底這種錯誤。

假使開納否認在工業中生產剩餘價值的可能性，是很錯誤的，那末，在其商業學說上，他就有很大的功績了，開納否認了在商業中生產剩餘價值一

一關於這一點，他是非常正確的。在這一點上，重農學派極銳利地駁斥了統治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之重商主義者底傳統學說。代表商業資本時代之商業資產階級底利益的重商主義者，過分地估計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對外貿易的作用。他們認為想國家的富裕，首先就須把金銀運入國內，而金銀之入口，只有藉助於對外貿易才能够，故重商主義者以對外貿易為國民財富之唯一源泉。

“增多國民財富，和增多國民之貴金屬的貯存底方法，為對外貿易”——十七世紀中葉的著名作家倒馬斯墨翰於其作品中開始即這樣寫着。開納底功績就在於他嚴厲地駁倒了這種重商主義者底概念。他認為國民財富的來源不是商業而是生產。不錯，開納以物理的自然的觀點去研究狹義的生產——生產新物品底生產。在這種狹義的生產中，他排除了工業，他說：“農業為國家和國民之一切財產的來源”。固然，開納很錯誤地不瞭解農業生產和一般生產之共同性；然而開納之偉大的功績在於他承認為純粹收入（剩餘價值）的來源不在商業範圍中，而是在於生產範圍中。照開納底學說，商業不

能把新的財富給國家)因完全自由競爭也好,特殊的獨佔交易也好,以及重商主義者之限制貿易也好,都是某種自然生產品和其他等值的生產品相交換的。“我看,商業不過是價值和等值的交換,並非生產。雖成交換有時會因某種環境之故是有利於對換的某一方面或雙方皆有利益。真可以這樣假設,交換所以有利於雙方者,因他們只有藉助交換,才能保證自己獲得其所需要的財富。然而,只要某種價值和其等值相交換,難道這種類似的情形不是任何時候都能都發生麼?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真正增加財富的。”商業雖有他底實利(和必需性)但並非為國家純粹收入(剩餘價值)之唯一的來源。

開納不光堅決地反對以對外貿易為特別有利之重商主義的學說,且極堅決地反對重商主義底者貨幣學說。重商主義的學說之過份估計對外貿易的實利,是和其過份估計貨幣作用相連繫的。他們所以要振興對外貿易者因對外貿易,可以盡量地輸入大批貨幣——金子和銀子。且也,他們以為增加國內的貨幣數量,很可希望發展工商業,使有利於商業資產階級。重商主義者,因處在商業資本主義時

代——那時候歐洲各國都在由半自然的封建式的經濟變到貨幣經濟之過渡時代——故醉心於對外貿易和貴金屬。但在十八世紀中葉，貨幣經濟已極成熟了。除掉商業資本而外，還有佔有極大優勢的投入工業和農村經濟中去的生產資本。農村經濟底代表即為重農學者。與主張輸入大批貨幣為有利的商業資本思想家，重商主義者相對立的重農學者，則以增加農村經濟之生產品的生產為最有利。重農學者極尖利地反對重商主義者底貨幣學說。主張取償於商業的和貨幣的資本去增添農村經濟之生產的資本。照他們底意思，最重要的為盡可能地去加多生產品的生產，而銷售生產品或把牠變成貨幣，那是毫無什麼困難的。“不是購買者底需求更大於出賣者麼？不是出賣者比之購買者更為有利麼？不是貨幣乃最好最活動的財富麼？一切商業之現存的事實——以最平常的財富而獲得了僅能容易這些財富之相互交換的貨幣的事實——尚未足說明這些財富麼？”

照開納底學說貨幣並非現存的財富，僅為便於現存財富之交換的工具。“貨幣並非永久的新陳

“代謝的現實的國民財富，貨幣不能生貨幣的。”  
“國家的富強不在乎貨幣的積蓄，而在乎財富之叢生。”貨幣僅為在賣買者間之中介的標誌底作用而已。金幣“沒有別的意義，除掉便於商品交換，為賣買者間之中介的標誌而外，因交換之最終目的，完全不在乎貨幣。”“賣買者所希望的並非貨幣，是交換的物品，只有在這些交換中，賣買者才能保證他自己的利益。”

重農學者在其貨幣論中，得出主張藉有利的貿易差額之助，輸入貨幣的重商主義政策完全錯誤的結論。為要輸入貨幣，重商主義者下令盡可能地擴大工業品之出口，而且盡可能地縮減工業品之入口。照重商主義者底意見，要使在生產品進口間達到有利的關係，必應由國家的制令和監督去考查工商業。我們已知，反對重商主義者之干涉經濟生活底重農學者，要求工商業之完全自由；他們尤共同意於政府，無須去注意貿易差額。因貨幣之輸入是毫無益處的。只要國內能多產農業生產品以及有利的麵包價格，則農業國無論何時，都可獲得為他所必需的麵包數量。“有了財富，無時可患貨幣之缺

乏，且隨時都能拯救貨幣的恐慌。”例為藉助於信用貨幣。反之，則金幣數量過多，於國家也無實利，國家僅需為完成賣買所必要的一定貨幣數量，已足敷用。

當我們已述明了，開納論農業，工業，和商業的學說，換言之，當我們已述說了重農學派的中心理論，“純粹收入”的學說以後。很易指出開納底這種理論與我們上面所講的他底經濟政策不斷地連繫着。真的，為要證明把資本由工商業中提出來轉投到農業中去之必要，開納證明只農業才為“純粹收入”（剩餘價值）的來源。為要撤消勉強地去振興對外貿易，俾得輸入貨幣底重商主義的政策計，開納即發揚其貨幣並非財富的源泉和對外貿易並不能使國家獲得任何純粹收入的學說。開納底理論系統，和其經濟政策之一貫的目的，為反對偏於商業的和貨幣資本底利益之重商主義政策，而建立保護農村經濟之生產，資本之利益的首要地位。開納底理論，很明顯地表顯出其社會階級的立場。

然而我們不應限於說明開納底純粹收入的學說，而證明其學說底社會階級的立場。我們還須答復：

開納這種學說的理論價值在那裡，爲什麼這種學說在經濟思想的發展上爲有那樣大的作用？爰其錯誤過多，故很難發揚出開納學說之理論上的價值，一眼看去，開納底純粹收入的學說我們可以說是有許多錯誤且無意義。上面我們已指出他底主要錯誤，在乎把社會——價值的觀點，和物理——自然的觀點相混同。且也，爲要尋找人們勞動之剩餘價值的根源，重農學者又以土地爲新物質的源泉。因此，重農學派就犯了二重錯誤，第一重錯誤，在乎農業的和工業的勞動過程間，原無什麼根本的差異，重農學者則以爲有極大區別了。不拘重農學者底意見如何，農業終是不能生產新物質的，他不過把散佈在地土地內和空中的物質變成麥子的物質而已，即僅把自然形態的物質或物體變成利於滿足人們慾望的而已。有個重農學派之最早的反對者，意大利的經濟學家物利曾說，在農業過程和工業過程之間是沒有什麼根本區別的，農業過程是把地中物，水和空氣變成了麥子，而工業過程是把蠶繭變成了絲織品。重農學者想以農業勞動爲唯一的生產勞動，因牠利用着博厚的自然物之力的活動。然而在工

業勞動的過程中，也有自然之力的活動。英國大經濟學家，李嘉圖曾說下面一段極明確的話：“難道自然在工業的勞作中不給人們甚麼嗎？難道風和水推動着機器和船的運動，是毫無用處的麼？難道，氣壓和彈性的壓力，給我們用以轉動大機器，不是自然的恩賜麼？不用再說，由於金屬之熔消的磨擦而發生熱的活力了，也不用說在染洗和釀化過程中之氣壓的活動了，總之，我們不能說，那個工業部門自然並未協助人們以博厚的和賜與的材料。”

重農學者之第二個，且在原則上之最大的，錯誤，為，由農業之特殊的物理的生產率中——即使那樣的——也不能得出提高農業生產品之價值的結論。馬克思以下面一段話去指明重農學者底這個中心錯誤：“重農學者底錯誤，由他把物質之數量——這個因自然之增長和繁殖出來的物質之數量就是農業與牧蓄和工業之區別——和交換價值之數量相混同中發生出來的。”重農學者把價值之增大的問題認作物質增多的問題了。他們以為工業勞動是不適於創造任何稀少的新物品，因而不能視他為生產

品底交換價值的來源，故不能視作高於勞動力價值的交換價值——剩餘價值的來源。如果重農學者不否認資本家的價值，不把他包括進生產成本中去，則他們必將信服工業固也能創造高於生產成本費之回復以外的利潤或純粹收入。重農學者把自然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價值的生產混同了，這種混同是由正處在從自然經濟過渡到交換經濟之過渡階段中的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農業之落後的條件所反映過來的。

雖說開納有這樣深沉的錯誤，但牠底純粹收入的學說，仍不失為一種使剩餘價值論發生大革命的，有效的觀念。重商主義者認為剩餘價值——超過生產成本費的餘額——乃某定量的商業利潤。他們知道商人以100盧布購得的生產品，可以很有利地出賣——尤其輸到國外市場上去時——例如150盧布。他們光看到商業利潤，“由出賣得來的利潤”這種利潤不是別的，僅為商品價格以外的餘額而已。聰敏的商人抬高商品的價格或價值去出賣其商品，因而即由購買者那兒獲得利潤了。故重商主義者認為剩餘價值之唯一形式乃商業利潤，而商業利潤之唯

一來源乃爲商品之非等價的交換，即提高商品的價值去出賣商品。這種重商主義者的觀念完全符合於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條件的，那時候，商人利用其獨佔的地位和對於殖民地之殘酷的剝削，貴二三倍出賣其商品，因而獲得偉大的利潤。開納之偉大的功績，就在於他把研究的重心由交換範圍中轉移到生產範圍中去。開納極堅決地聲明商業不過把已製成的財富由這一個人手中轉到別個人手中去而已。倘若交換的某方“由出賣得了大部份利潤”，只有他方同時失掉這些價值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重商主義者僅知某方因取償對方而致富。但他們並不知這種來源產生於某一方的財富，完全同樣地，轉到對方的轉移中去的。

重農學者第一就提出絕對收入而非相對收入的問題，甚至提出在生產品之平等交換的條件之下，也能增多財富（價值）的問題。很明顯地這樣增多的財富，並非發生于交換過程中，而產生於交換過程以前的生產過程中。價值係創造於生產過程中，且在生產尚未出現於流通過程以前即已確定了的思想是屬於重農學者的了，且又組成了剩餘價值之必需的

基礎。如說重商主義者(尤其是白耻)給勞動價值論以最初的雛形，則重農學者就有提出剩餘價值問題(雖然因他們尚缺乏正確的價值理論，仍未正確地解答這個問題)之偉大的功績了。科學的發展，就發生了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之綜合的嘗試(斯密士和李嘉圖)——到了馬克思才把這綜合完成了。

## 第五章

### 開納底“經濟學圖表”

在介紹重農學派底純生產品的學說以後，現在我們應去研究重農學者底第二個中心學說——整個的社會再生產的學說了。因此，我們須詳細地去分析開納之有名的“經濟學圖表”，那圖表，以極簡短的傑作明確地描述着在各階級和各生產者間之社會生產品底再生產和分配。

開納於1758年，初次草成“經濟學圖表”且在國立印刷局印成數冊。路易十五親自參加該書之裝印，已為久傳的美談。事實上，他底參加是因為聽從其醫士開納的忠告，為增強其健康而稍事徒手勞動，其間也有為那小小印刷事業而專門特別操作的勞動。開納底“經濟學圖表”之寥寥無幾的幾紙印刷品，後來又都喪失了，僅於1849年才於米拉婆的稿紙中找到其初稿。朦朧模糊於“經濟學圖表”的註解者，則往往以為開納於1766年出版其最透澈最明確的“經濟學圖表的分解”。開納

門徒之解釋“圖表”者則隨時隨地都給這圖表許許多多紊亂的註疏。

重農學者都崇奉“經濟學圖表”為最偉大之科學的發明。照米拉婆的說法：“有史以來只有三大發明：第一為信件之發明；第二為貨幣之發明；第三為前二者之結果的‘經濟學圖表’之發明”。在別一方面，於十九世紀初，加尼則表示其反對重農學派的意見，他說：“這種稀奇古怪的著作，怪難瞭解的，滿紙都是些奇異的數目字，這“圖表”之可疑，比之說明重農主義的學說更甚。”這“經濟學圖表”遺留到十九世紀中葉恩格思稱為“舉世之謎”，這種謎語，非科學的思維所能分析和利用的。馬克思實為指出這“圖表”有偉大科學意義的第一人，現在這圖表的偉大意義已為一切經濟思想史的學者所公認了。

再來分解“經濟學圖表”。開納分整個社會為三個階級：1，“私有財產者”（地主以及國皇和僧侶）的階級；2，“生產者”階級（代表所有以農為生的農莊家）；3，“不生產的”階級（以工商業為生的居民和自由職業家等等）。一周年中生產出來

的社會生產品，如何分配於這三個階級之間呢？

假使以秋季為一生產年之終期，和下生產年之開初的時期，這時候生產者階級（以後都叫做農庄階級）已結束了秋收，再設一切收成等於五萬萬盧布。農庄家為了這些收成之獲得，在本年內共化了：  
1，流通資本二萬萬盧布（一切農家的生活費，牲口的食料，以及種子等等）；  
2，其固定資本（農具，牲口）之修理費和添補費為一萬萬盧布。總之農庄家之耗費為三萬萬盧布，而收成則共值五萬萬盧布。二萬萬盧布的餘額即為純生產品或純粹收入，由農業家創造出來，而以地租或租金的形式納歸土地所有者（以下皆謂之私有產者）的階級。這二萬萬盧布的租金，是農庄家於本年度初，以現金納歸土地所有者的，那些現金，到現刻仍為土地所有者所有。末後，“不生產者”的階級（以下改稱之工業家）於新的生產年之初已積有在本年度所製成的二萬萬盧布之工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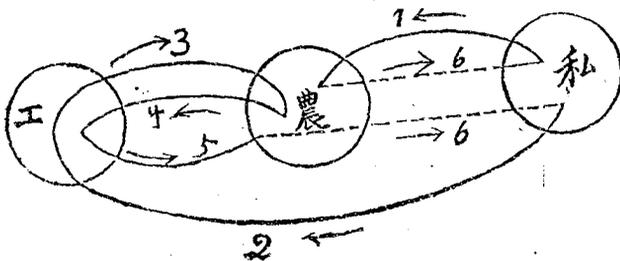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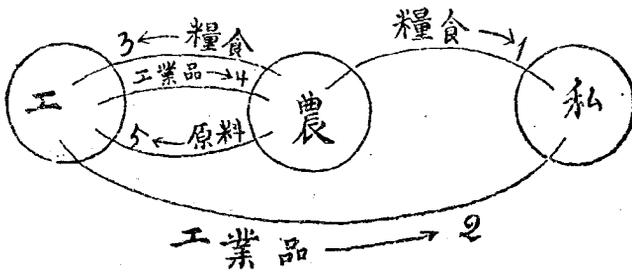
故於新生產年度之初，全社會上已積有下面的生產品和現金了。

1，農庄家有值五萬萬盧布之農產品的積蓄（其

中糧食值四萬萬盧布，為工業之改製的原料值 1 萬萬盧布)；

2, 私有產者積有二萬萬盧布的現金，這些現金他於本年度初，由農庄家那兒以租金的形式取得的；

3, 工業家積有值二萬萬盧布的工業品。



現在要開始了在那三個階級間之交換或流過程了，這種過程由他們間許多買賣的行為去完成的。為便於說明起見，我們在上面畫了二個圖表，其中第一個圖表是說明生產品之流通的，而第二個圖表則說明在各階級間之現金的流通。

在表中可以看出，流通之第一行為是私有產者向農莊家購得 1 萬萬盧布的糧食，用作下年度中整年的滋養品。在第一行為中，1 萬萬盧布的糧食由「農」轉移到「私」，而現金則適相反地由「私」轉到「農」（參看第二個圖表），流通之第一行為終了以後：生產品和現金分配如下：農莊家有 4 萬萬盧布的農業生產品，（其中 3 萬萬盧布糧食，1 萬萬盧布原料）和 1 萬萬盧布現金；私有產者有 1 萬萬盧布糧食和 1 萬萬盧布現金；工業家有 2 萬萬盧布工業品。

流通的第二行為乃私有產者以其淨下來的 1 萬萬現金向工業家購得工業品，用以滿足其一年的消費；這種工業品由「工」轉到「私」，而現金則由「私」轉給「工」。流通之第二行為完了以後：「農」有 4 萬萬盧布的農業生產品（其中 3 萬萬盧布糧食

，1萬萬盧布原料)和1萬萬盧布現金；「私」有1萬萬盧布糧食，和1萬萬盧布工業品；「工」有1萬萬盧布糧食和1萬萬盧布現金。

流通的第三行爲，爲工業家以其由私有產者那兒得來的1萬萬盧布現金，向農莊家購得爲其在一年內滋養品所必需的糧食。流通的第三行爲終了以後，「農」有3萬萬盧布農產品，(其中2萬萬盧布爲生產品，1萬萬盧布爲原料)和2萬萬盧布現金；「私」有1萬萬盧布糧食和1萬萬工業品；「工」有1萬萬盧布工業品，1萬萬盧布糧食。

流通的第四行爲，爲農莊家以其由工業家那兒取得的1萬萬盧布，向工業家購得工業品，按我們的假設，這些工業品爲，因修理和添補固定資本所必需的工具和器具。第四行爲終後：「農」有3萬萬盧布的農產品(其中2萬萬盧布爲糧食，1萬萬盧布爲原料)和1萬萬盧布工業品及1萬萬盧布現金；「私」有1萬萬盧布糧食和1萬萬盧布工業品；「工」有1萬萬盧布糧食和1萬萬盧布現金。

最後，流通的第五行爲，工業家以其剩下的2萬萬盧布向農莊家購得農工業的改製所必需的1萬

萬原料。流通第五行爲終後，「農」有 2 萬萬盧布糧食，1 萬萬盧布工業品和 2 萬萬盧布現金；「私」有 1 萬萬盧布糧食，1 萬萬工業品；「工」有 1 萬萬盧布糧食和 1 萬萬盧布原料。

開納底圖表，雖甚簡樸，然究屬以一貫的形態去解釋生產的再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底整個社會過程之第一次偉大的創舉。開納想揭示再生產之社會過程的途徑，即想探尋不斷地的，按時重複再生產過程之可能性的條件，開納把其“圖表”底起點始於秋收之際，那時候，他把一年的社會生產品看作整個的，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生產品並非爲自己的消費，而是爲到市場上去出賣的，故當生產終了以後，即應進行由許多賣買行爲所組成的流通過程。“圖表”把整個流通過程，分作各階級間之五種賣買行爲。在事實上，“圖表”中所述說的每一行爲都在許許多的個人們間之單獨的賣買行爲所組成的。例如第一行爲，1 萬萬盧布糧食由「農」階級轉渡到「私」階級去；事實上，是聯合着地主向農莊家之購買之幾千萬單獨的行爲；然在“圖表”中則把這些單一性的行爲合併成同一行

爲（第一行爲），這行爲是包含一切地主以貨幣——這貨幣他以租金形式由農莊家處獲得的——向農莊家購買糧食的行爲。開納注意每一流通行爲都帶着社會階級性的，因他協助着生產品由某社會階級過渡到別一社會階級去。故開納並未把由某階級內部的份子間所完成的買賣行爲，包羅其流通圖表中去。例如，農莊階級剩下爲一切農業者（莊家和農夫）所必需的滋產品，2萬萬盧布的糧食。這些生產品之一部份，很可以在農莊間流通着（例如，從事牧畜的農莊向從事農業的農莊購買麵包等等。）但那並非由農莊階級過渡到別階級中去，故開納不把他包括其流通表中。

開納不光注意到自然物品運動的流通過程，他並且留意到與生產品運動的方向相反的現金運動的流通過程。開納底圖表很明白地指示出，貨幣運動僅爲便於生產品運動之次等的附屬性。總數值5萬萬盧布之生產品的流通，僅用2萬萬盧布總數的現金已够了。其中的一半（1萬萬盧布）僅執行了1萬萬盧布的生產品的流通（第一行爲），其餘1萬萬盧布現金才總共執行了四次流通行爲（第二）

第三，第四和第五次行爲)。2萬萬盧布現金的總數，當流通過程開始時，是在「私」階級手裡，而到流通過程終結時，則落入「農」階級手裡了。從此後，又怎樣呢。當流通過程終了以後，「農」階級又把現金，以新年的租金形式納諸「私」階級。這種單方地把2萬萬盧布現金由「農」階級轉到「私」階級去，是在第二表中以虛線表明之（第六行爲）。其中每一虛線表示轉讓1萬萬盧布。在第二表經了過後，很明顯証明貨幣之一手轉一手，仍回轉到原先出發點去之不中止的循環運動：1萬萬盧布由「私」轉到「農」，再由「農」轉回「私」；其他1萬萬盧布元由「私」轉到「工」，又由「工」轉到「農」，再由「農」轉到「工」，過後又轉到「農」，然後，才以租金的性質落入「私」手。

上面所述說的整個社會生產品之毫不中止的流通過程是表明在社會各階級間之分配，且只有生產品底分配完成以後，才能在先前的範圍內重新進行生產過程。農莊家有2萬萬盧布糧食，用爲一年內他們自己和工作人員之食料（且包括種子，和牲口之飼養料等等），和1萬萬盧布的工業品用作增補其

已耗費掉的那部份固定資本。所以，他們已收回了一切流通資本和已耗費掉的那部份固定資本，且能再進行其原有範圍的生產過程，再過一年又能得到價值 5 萬萬盧布收成了。工業家階級也已有其必需的糧食（1 萬萬盧布）和原料（也值 1 萬萬盧布），且籍後者，於一年內又能製成值 1 萬萬盧布的工業品，（等於原料的價值加上生活資料的價值），故農莊家和工業家所積有的生產品，都已足夠人們的消費和生產的消費——即下次再生產過程的消費了。末後，地主也已有為其一年內所必需消費的糧食和工業品了。

在“經濟學圖表”中所說明底社會再生產的理論，為開納之最有價值的理論的遺業。在這圖表中，作者的思想，表露出很少可以比擬的偉大的力量。開納勇敢地，簡括地，劈開了一切個別的瑣碎的方面而把生產品之一切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過程，都歸到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去。開納的思想有這樣的偉大！他把一切的國民經濟都看作在農村經濟和工業間之物的交換，他把一切社會都看作幾個大社會階級的總和；他把全國生產底生產品，

都歸納到用幾次主要的流通行爲的方法而分配於各主要的社會階級間之一貫的社會生產品。按時重複再生產的過程之經濟的概念；乃每年更新再生產過程的生產品的國民財富的概念；再以及在整個社會階級間分配國民財富的概念——所有這些由斯密士和李嘉圖所推闡出來的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底基本觀念，都是屬於開納的。

雖說開納底“經濟學圖表”有了錯誤，而其主要的觀念，則已深入於經濟科學之神聖的根基中，且一直繼續到現在——當然，是在新的形式中。開納底社會再生產論不僅超絕於當時，抑且冠於古典學者（斯密士和李嘉圖）。固然許多問題，尤其是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都是在開納以後才完成的。然於社會再生產論，則他們不但並未發揚了開納的觀念，甚至還落在開納之後。迨經過百年後，馬克思才承續開納底這種理論。在馬克思於1863年給昂格思的信中很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爲他自己的社會再生產的圖表——列入“資本論”第二卷末——是修正和發揚開納在其“經濟學圖表”中所推闡過的觀念的。

## 第六章

### 重農主義者底社會階級的立場

一般地利用重農學派底觀點，但又不承認自己爲重農學派之份子的偷爾柯對重農學者說有下面一段話：“你們是工商業的保護者，但你們碰着了由他們的敵人所表示出來的釘子。”這幾句話充分地表明着在重農學底體系之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性質和其反資本主義的形態之外表間的矛盾。照馬克思的說法，則“這種外表是欺負貴族門下客的開納醫士的，在開納的理論上很可以看出他是保護農業的利益而反對資本主義式的商工業的。應補說明白，這種外表久已矇蔽了經濟思想史家，他們往往把重農學派的體系看做阻止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而復興家長式的農業之統治底反動的歷史輪迴的企圖”。甚至於到現在，在馬克思揭示出重農學派體系之資本主義性不久以後的學者，——有些歷史學派——都仍以重農學者爲“地主和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山耳氏爾以爲“農業國應振興農村經濟，開墾其土

地而種植之；”同時，如“重商主義者則以爲國家應建立於富有的商人底基礎之上。”

無須詳細地証明，以重農學派底體系爲地主的貴族底思想者，是如何地錯誤的。重農學者並非想保留在農村經濟中之聖主的制度，而是想把農村經濟改建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即想剷除在鄉村中之封建制度。儉爾柯曾視自廢除過大都市壓在農民身上之自然的過關稅，而以由貴族地主負責償付的貨幣稅代替之，致引起後者大不利的風潮。且也，這不過是要使貴族坦負稅賦的第一次懦弱的試舉。在要求由地主的租金去納付的單一稅，去代替一切其他雜稅的重農主義底政綱上看去，不應說重農學者乃貴族和一般的“地主”階級的思想家。

在這種情形之下，還不能說重農學說乃代表“農業家”階級——尤其是農民——的利益麼？這種觀點仍深入於企圖尋找重農學派之國民化和農民化的傾向底有些學者底腦中。他們頗摘引幾個開納底字句，由於“農民的貧困”“貧窮和國家”故須免除了毫不能獲取超過其生活資料所必需以外的些許純粹收入底小農之稅賦等等。然而這種意見是

很錯誤的。當然這是因開納曾想把一切稅賦之重負，都轉移到收取租金的地主身上去，而免除不能取得任何純粹收入(租金)底農民之稅賦。當然這是由於他曾主張提高麵包價格，使麵包的生產者——農民因而有利。然而，開納要求這些改革，並非爲廣大農民羣衆的利益，而是代表農業家階級的利益。真的，他以爲國家的貧困由於“農民的貧困”然而濟貧則應在交換經濟中去尋求能變成資本主義農業而僱傭許多“貧農”的“富農。”重農學者並非爲“開墾土地而耕種之的農村貴族。”想去組織農村經濟，也不是爲小農，而是爲富有的農業家才去組織的。並不反對在農業名目下的資本主義，而努力於振興農業底資本主義，此乃重農主義者政綱之最大的特點。

“馬克思實爲揭示重農主義學說之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性的第一人，後來我對於重農學派之專門研究，完全証實了他底觀點。然而許多學者所謂的重農學派之資產階級性是極廣泛而模稜不定的。他們在重農學者之要求自由貿易的第一種計畫上看到了自由貿易觀念——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舊政體的

旗幟之下——之廣大的河流中的一小支流。依格爾麻說：“重農學派底任務在乎批評，在乎破壞：他們僅在更有系統的形式中達到了自由工業，他們僅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這種目的，早已顯現於英國和法國了——之強有力的承繼者。”

然而在這種說法中是完全不懂在重農學者之自由貿易的口號和其他各部份之重農學說（農業生產率的學說，純生產品的學說等等）之間是存有怎樣聯繫的——這種聯繫也為重農學派底特點。

總之，把重農學派視作反對資本主義經濟之反動的抗議書，是不正確的；反之，却又不能把重農學派底政綱僅限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性上。我們應說明重農學派之較切當的社會階級性，且證明他是代表那種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底利益的。劈開了模糊重農學派底體系之階級性各種類似的矇矓的背景（如受了貴族等級的影響，使開納陷入形而上學的觀點），可以說重農學派之最終而且是整個的企圖，是想為振興且鞏固農村資產階級——即農庄階級及由此所發生出來之富裕的農民——而創造有利的社會基礎。農村資產者之階級利益的延廣即須要求很

快且很有力地振興資本主義經濟；故與當代一切資產階級之思想家相雷同的重農學派之革命方面的政綱，爲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去改造農業之要求（即消滅在農村中之采邑制）和工商自由的口號。在另一方面，在農村經濟和工業間之利益的分歧，爲重商主義所熱望的“剪刀形”的分歧，又創造了在重農學派和城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間的鴻溝，且重農學派的思想建立在地主階級和絕對專制君主相妥協的立場上；由此發生了痛恨貨幣資本之大農業和絕對專制的傾向，願望減低商工業的利潤，使之僅够爲其生活資料所必需的水平。且要求提高農村經濟生產品底價格。

爲農村資產階級思想家的重農學派底階級性不光在其實際要求中表現着，且也在其純理論的論點中流露出來。重農學派之理論底中心在乎再生產論和純粹收入論。這些理論組成了一貫的連續的目的：重農學派證實再生產不光能收回已投在事業中的資本，且能產生餘額或純粹收入；換言之，他們認爲再生產乃純生產品（純粹收入）的生產。照他們底意思，只有農業才可謂爲在這種意義上的再生

產，至於工商業則僅生產循環的財富，并不能產生餘額。由此，在邏輯上，即得出用抬高麪包價格和資本投入農業的方法去培植農村經濟的政策。故再生產論和純粹收入論遂變為反對培植商工業的重商主義政策而保護農村經濟利益之理論上的武器。

然而並非任何農業過程都有純粹收入底生產（或為狹義的再生產）的地位，僅在能投入大批資本進大農業經濟中才有之。為使再生產能經常地有效進行而要求以大農業去代替小農業。故再生產論和純粹收入論又形成了解決在農村資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羣衆間之社會糾紛的中心理論上論證的作用。

末後，再生產論和純粹收入論又證明了經常地重復生產過程只有在神聖地保持農業資本的條件之下——即在租金和稅賦的總和不超過純粹收入的總數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由此又得出把一切稅賦都由純粹收入（地主的租金）去擔負的要求。故再生產論和純粹收入論又成為重農學派處在農村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商工業資產階級，農民和地主階級）間之互相關係和矛盾的社會利益所纏結

著的複雜旋渦中準定超向的理論上的工具。

爲農村資產階級之保護者的重農學派底社會階級立場，我們可用以說明他們和十八世紀後半期法國資產階級底革命思想家的關係。某作家論“重農學派和革命運動之密切的關係”說“革命運動爲他們所組成的一翼，”而其描述重農學派，則謂爲“卒使實現法國革命之最早的企圖者。”而別一作家則反對這種見解，他竭力謂開納有保守的傾向，且指明：“重農學派很少留意於撤消封建貢稅，僅以其經濟自由和以自然的貨幣貢稅去代替的原則間接地協助他。“這些不同的見解，可以由重農學派底二重社會立場去說明之：想完全取消在鄉村中之采邑制，俾利於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的資產階級底代表；爲農村資產階級——這乃是少數的，無威權的而且是落後的資產者的等級——底代表，他們夢想着藉舊政體（絕對專制和大地主階級）之政治的和社會的力量之調節的方法，去鞏固新的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基礎；在此，他們又看到爲土地利益而鬥爭之聯盟的可能性。保持貴族地主，並非重農學派之直接目的，他們底政綱是要銳利地——雖其形態

極模糊——反對地主。重農學派堅決地要求：第一，把等級的，貴族的，半封建式的農業變成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第二，保護大農業者底利益而反對地主（長期租種契約），保護大農業者，使之去改良農業；第三，提倡把一切稅賦都由地主去摺負。他們遵守了這些條件，真實地去保護大農業的利益，甚至爲此而努力創造出許多論証。然而不應忘記，第一，在保護大農業當中，他們僅看見了在農村資產階級利益中，和平地施行資本主義之土地改革的可能性之必需的妥協和條件；第二，他們所提出的條件，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都等於消滅貴族式的地主，甚至（引用馬克思的說話）“部份地沒收土地私有權。”

重農學派底政綱可以說是建築在農村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間之妥協上，施行和平的土地改革的方法，去尋找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首先即在農村經濟範圍中）底道路的企圖。這種企圖是烏托邦的，無希望的。這種企圖之主要的錯誤，就在乎埋沒了社會的力量，這種力量到了十八世紀末，已能爲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爲城市商工業資產階級

——而開闢道路。重農學者論農村經濟之首要意義，謂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很錯誤的：資本主義底前哨乃商工業。甚至在農村經濟範圍中農村資產階級也覺發展法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太少社會的基礎；重農學派惑於英國大農業經濟之成功，而埋沒了硬把土地保存着不肯脫手而樂於組織大農業的無數的法國農民群衆。在法國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並非在於農村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和平土地改革，而是由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和鄉村的農民群衆之偉力所完成的大革命。革命後，法國已非大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國，而是小農的農業國了。

往往可以並到在末後幾年來舊政體企圖平和地，妥協地去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者，是不能幸存於十八世紀的法國。特使問題更爲擴大，使舊政體日趨近於滅亡而已。重農學派的草案之命運上如此。儂爾柯首先虔誠地企圖去實現他們（取消釐金，行會的法規，麪包貿易的自由）即引起反動的社會集團（特權的貴族，僧侶，財政的高利貸者）之有力的反對，且很快地不施行了。絕對專制和地主階

總，不管重農學派底願望如何都不歡喜稍稍便於施行社會改革的。在這種條件之下甚至連重農學派底政綱——照創造這政綱者的意思，在於毫無弊害地把舊政體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的政體上去——也都是舊政體崩潰的根源，且客觀地協助着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重農主義蓋上一層泥古的簿膜而蘊含着“革命的細菌”（馬耳來夫——在其論波蘭的重農主義者的作品所說的話）。且也，儉爾柯的活動也形成了“推動法國革命”（馬克思語）的作用。



重農學派理論底創設者

**法郎士 開納**

——其生平及學說——

魯平著

陶達譯

無此章者



作翻印論

1932年六月出版

定價：每本實洋四角  
印行者：寒微社  
(北平虎坊橋No114)  
分售處：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各省中華書局，民智書局，北新書局。

